

抗戰初期的知識女青年下鄉 ——以江西為例的研究*

柯 惠 鈴**

摘 要

戰時婦運試圖開啓新的局面，國難聲中，團結各階層婦女的口號震天價響。除女知識份子、女學生、女工，這些自二〇年代以來即居於婦運主體的婦女屬群外，在救亡圖存的旗幟下，占據婦女人口多數的農婦、家庭婦女也被列入婦女工作亟需發展的對象。抗戰爆發後，大批城市婦女從沿海向內地遷移，她們將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結合，重塑戰時知識婦女的時代任務，以動員農村婦女為工作目標，開創了戰時婦女工作的主要方向。檢視抗戰婦運究竟如何深入一般婦女群眾，實則是探討知識婦女及女幹部們的婦女工作經驗。知識婦女與農村婦女出身不同，期刊、報紙材料所描述的農村婦女動員，並不能視為農婦真實聲音的完全呈現，許多內容不能不考慮是婦女幹部

* 本文初稿曾於戰爭、性別與日常生活工作坊發表（2010年6月29日），承蒙與會學者多所指正，送審期間復承兩位匿名審稿人的細心閱讀及斧正，謹誌謝忱。

**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將農婦視作「他者」而有的調查及評述。因此本文研究的焦點即調整為江西省知識婦女的戰時農婦動員。

關鍵詞：抗戰、婦女運動、江西、農村動員

一、前 言

北伐時期策動婦女運動與政治緊密連結，到了抗戰時期知識婦女再次大規模地投入社會與政治工作中。北伐婦運以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為號召，抗戰的婦女動員，為日本侵略中國的民族意識與愛國精神所激起，兩者皆有動員群眾婦女的作法。北伐的婦女群眾動員最顯著的是城市的女工，至於農婦，除了南方極少數的縣份外，幾乎無顯著成效。¹ 戰時婦運試圖開啓新的局面，國難聲中，團結各階層婦女的口號震天價響，因此婦運除女知識份子、女學生、女工，這些自二〇年代以來即居於婦運主體的婦女屬群外，在救亡圖存的旗幟下，占據婦女人口多數的農婦、家庭婦女也被列入婦女工作亟需發展的對象。² 當沿海城市一一

1 北伐時期對於農婦的動員主要由各地婦女協會主持，不過，由於農民運動是群眾運動的主軸之一，解放農婦易引起農民的敵意，因此農婦運動往往無疾而終。除了剪髮、放足等一度在兩湖地區沸沸揚揚之外，農婦根本仍與國家、社會無所關聯。參見柯惠鈴，〈性別與政治：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1900s-1920s)〉（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1月），頁219-281。

2 北伐時期的婦女運動承襲五四新文化的女權訴求，在華南一些省份，離婚自由、職業開放等女權問題成為婦女運動的主要內容，而在左派勢力的影響下，婦女運動往往包含著婦女解放的意義。北伐時期所標榜的群眾動員，政治力雖介入，仍強調由下而上的民眾自發性，在各種婦女運動的文獻中，甚少出現「婦女工作」的字眼。到了抗戰時期，為配合抗戰建國國策需要，以及盡可能挖掘更廣大的婦女群眾力量，因此由上而下的婦女工作便成時代主流，「婦女運動」、「婦女動員」及「婦女工作」在抗戰時期成為可以互相替換的同義詞。江西省婦女指導處第三任處長杜隆元即言：「過去的婦女運動，對象完全是智識份子的上層婦女，現在的婦女工作的對象則除了知識婦女外，更著重於未受教育的廣大農村婦女，對象既有此不同，工作方式也就各異，過去的婦女運動，是表現在都市的上層社會裏，現在的婦女工作，是普遍於農村，達到每一個農村的角落，走向廣大姊妹群中去適應她們的需要，

淪陷，農村的資源就成了補充人力、物力、財力的後備基地。戰時婦運的訴求往往視農婦爲一股龐大的潛在力量，能夠動員她們加入救亡的行列，對抗建事業而言，等於注入源源不絕的精神及物質戰力。

農村婦女在婦女人口數中占據最大比例，但也最封閉，她們遠離國家並與社會脫節。自清末至抗戰，近代中國女權思想、婦女運動變化激烈，農婦卻極少參與其中。整體而言，她們是一群實質存在，卻無法替自身發聲的婦女群體。一般說來，農婦居處分散、生活貧困、成份複雜，雖說文盲極爲普遍，不過其中有少數富室之家，也有部分受過教育者。年輕婦女與年長婦女往往分立，血緣、地緣的凝聚力極強，農婦社群的領袖一般具備服眾的能力。³ 城市、農村社會經濟文化殊異，來自城市的女性要動員農村婦女，必須採取特殊的手段。

抗戰爆發後，大批城市婦女從沿海向內地遷移。她們將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結合，重塑戰時知識婦女的時代任務，以動員農村婦女爲工作目標，開創了戰時婦女工作的主要方向。戰時婦女動員，包括指導、主持、設計與實踐等工作，主要出自城市知識婦女。她們對於國難中的婦女，在家庭、社會與國家所應扮演的角色及肩負的責任，有著跨地域、跨黨派的協合趨向。從中央到地方，無論前線、後方，婦女參與各式各樣的戰時服務，從知識婦女擴及到廣大群眾婦女。事實上，三〇年代以來，中國知識階層婦女隱然採取一種鬆散集合現身表達意見的方式，藉此來彰顯一些社會議題的爭論，進而操控公共輿論與意見關注的去向。知識婦女之間缺乏政治的約束，但卻能求取不同意見之最大公約數，超越黨派、階級與職業的分野，廣納包容歧異，以此占據公共輿論版面，隱然形成一股爲數不多但具代表性的意見與行動，在爭取婦女社會待遇平等及修改法律上所造成的影響十分顯著。⁴ 知識婦女發展出的包容各

去為她們服務」。杜隆元，〈江西省婦女指導處成立兩週年——婦工會議開幕詞〉，《江西婦女》，卷6期1、2合刊（1941年10月10日），頁7。

3 Kay Ann Johnson,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 7-26.

4 南京國民政府進行刑法修正時，針對通姦罪最終採納婦女界的意見，也就是通姦不分男女，處同等罪刑。最近有學者研究指出能得此結果，是婦女團體間策略聯合，

方、議題取向的活動方式，在戰爭腳步的逼近下更見清晰。抗戰爆發後，蔣委員長夫人宋美齡女士以全國婦女最高領導者的角色，召集各省婦女代表在廬山集會，是為協合全國婦女領袖關於戰時婦運工作的進行。會上，關於戰時婦運有了原則性的宣示，⁵ 維持了北伐以來垂直性的婦運模式，又不失橫向廣納眾議的新義。此後，各省婦運機構以相同目標為出發，不過，從建立婦女組織、網羅幹部到工作計劃的擬定都具有一定的自主。

抗戰各省的婦運主持人多半是省主席夫人，⁶ 她們作為國府中央與省處婦運的主要聯結，在其指導之下，以省為單位的婦女團體及機關相繼成立；實際負責婦女工作者則是省以下的各級婦女幹部，她們是行政機關、社會團體與婦女群眾間真正的溝通橋樑。檢視抗戰婦運究竟如何深入一般婦女群眾，實則是探討知識婦女及女幹部們的婦女工作經驗。知識婦女與農村婦女出身不同，期刊、報紙材料所描述的農村婦女動員，並不能全然視為農婦真實聲音的呈現，許多內容不能不考慮是婦女幹部將農婦視作「他者」而有的調查及評述。因此本文將研究的焦點調整為江西省知識婦女的戰時農婦動員，之所以選擇江西省為研究範圍，係因該省婦運在全國之中具有特殊性。早在剿匪時期，中央就極重視贛省的政治改造，從行政效能到官員精神革新，都顯示出新氣象。⁷ 省主席熊式輝更是蔣介石極為倚重的地方大員。戰前江西省的婦女工作，既忠於

並且操縱公共意見的走向，聯盟與議題取向的婦運方式，在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特別活躍。Lisa Tran, "Sex and Equality in Republic China: the Debate Over the Adultery Law," *Modern China* 35:2 (March 2009), pp. 191-223.

- 5 蔣夫人說：「各省的婦女工作，已經做得很多，可是還不夠和國家的需要配合。所以我們必須訂定一個全國性的婦女工作綱領，使全國婦女工作的各方面，可以互相聯繫起來」。宋美齡，〈婦女談話會演講詞〉，黃伯平，《蔣夫人與中國》（臺北：東南出版社，1961），頁422。
- 6 如廣西的婦運就由省主席夫人吳菊芳女士領導，該省婦女工作的組織有新運婦工會婦幹班、婦女生產工作團。田萌，〈訪問李主席夫人〉，《江西婦女》，卷2期6（1940年2月10日），頁42-43。
- 7 Hung-mao 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96-114.

中央的婦運綱領，又有獨立開展的企圖；戰時，更突破性地將婦女工作列為省正式行政部門。烽火連天之下，婦運作為戰時地方行政改革的一環，仍有長足進展。

中國農村社會複雜，各種勢力交錯盤據並不因戰亂而稍緝。江西省女性知識份子克服險阻，擴大工作到那些長久以來與外界隔絕的農婦之中。姑不論省婦女工作革新的成績，各縣農村婦女的處境及她們的生活，透過知識婦女下鄉被轉換成大批文書及工作報告，本身即為近代中國婦運史上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知識婦女幹部的外表、身份、觀念及生活方式，無一不流露城市文化的痕跡及現代性的展演，當她們進入農村調查、記錄、改造農婦之際，是否掉入殖民方式的論述？⁸ 知識婦女究竟如何進行農婦的動員？又為農婦生活帶來何種新的變化？本文著重知識婦女下鄉的過程及經驗，將各種工作報告、集會討論與計劃視為一種知識階層與農村交涉的過程。⁹ 它是戰時中國知識婦女所採取的新婦運方式，並且也可視作是知識婦女擴大自身社會參與的表現。

過去研究戰時婦女動員往往以上層及中央的婦女團體及組織活動為主，¹⁰ 雖能呈現中國婦女活躍的戰時形象，卻不免有歌功頌德全面揚舉之嫌。本文探討江西省在抗戰時期的婦女動員，將焦點從全國範圍的婦

8 被殖民者為擺脫帝國主義的宰制，在追求國家強大的努力中，無可迴避地移用殖民者言論以進行各種社會改革。自此，被殖民者及殖民者在某些社會問題的立場上，就變成同一陣線。Partha Chatterjee,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Colonized Women: the Content in India," *American Ethnologist* 16:4 (November 1989), pp. 623-625. 近代中國自清末以降，諸多關於傳統婦女地位的批評及現代女權的主張，不乏借鑒於外人看法，對於農婦的批評亦屬同一脈絡，難脫殖民的觀點。

9 本文研究主軸是探討抗戰初期江西知識婦女下鄉進行婦女工作的經驗及成果，在研究方法上著重於解讀知識婦女書寫的工作報告及自身經歷，因此期刊、報紙成為本文運用的主要材料，檔案部分較缺乏。

10 較早的專著有：談社英，《婦運四十年》（臺北：撰者，1952）。該書對抗戰婦運全面揚舉，後來的研究不乏承襲這種高度肯定的態度。梁惠錦，〈抗戰時期的婦女組織〉，《國史館館刊》，期2（1987年6月），頁169-188。論文有王孟梅，〈抗戰時期的婦女工作〉（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關於抗戰婦運的研究，實有許多角度可以發揮。

女運動移到一個省區，從知識婦女進入農村的角度出發，檢視抗戰的社會變動。在救亡圖存的時代環境裡，矇昧的農村婦女被納入覺醒的「中國婦女」之中，菁英婦女與農村婦女交疊影響，打造戰時婦女的時代新面目，從而開啓婦運的新里程。

二、群體中的個人主義：知識婦女到農村

許多婦運領袖視抗戰婦運為中國婦女運動的新階段，並且從各個角度去詮釋及宣傳，該如何調整及進行婦女工作。抗戰爆發後的一年，蔣夫人在廬山召集全國各界婦女領袖談話會，商議組織一個全國性的婦女工作團體，會中決定將一切婦女工作歸在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領導下進行。無庸置疑知識婦女是戰時婦運的主幹，其領導的婦女團體普遍聯合是戰時最有力的婦運號召。不過，戰火殘酷的威脅，促使婦女運動的範圍試圖超過以往的侷限。蔣夫人領導的中央系統婦運，統籌全國性的婦女工作，在推展過程中反而鼓動各省開展省內的婦女工作，後者是抗戰婦運深入基層的開始。

民國 27 年宣布的「抗戰建國綱領」第 32 條條例指示「婦女應服務社會，以增加抗建力量」。¹¹「服務」成了抗戰婦運的核心精神，從中央到地方有關戰時婦女應如何發揮自身的力量，各種言論見諸報端，蔚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戰爭爆發後，沿海地區諸大城市及鐵路沿線淪喪敵手，知識婦女四散奔離，紛亂之際，光怪陸離的現象層出不窮。富戶之家的婦女，有的回到敵人後方，安處於上海、北平和天津等大城市，享受紙醉金迷生活；有的逃到大後方，遠離戰火，度自身的安逸日子，亦有一部分出面主持救國事業、辦理慈善工作，將其作為出風頭、爭名奪利、升官發財的憑藉。¹² 這些靡爛又缺乏貢獻的上層婦女作為，時人往往痛心疾首地大加撻伐。有鑒於知識婦女動見觀瞻，又有能力可以領導

11 《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臺北：教育部，缺出版年），頁 6。

12 〈新時代的中國與中國婦女〉，《婦女新運》，卷 4 期 1（1942 年 1 月），頁 3-5。

工作，輿論不斷疾呼知識婦女要勇於擔任領導全國婦女的責任，最積極的就是赴前線或到農村。¹³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中國婦女運動自清末發軔以來，經過 30 多年的城市洗禮，第一次號召知識婦女到農村。

農村婦女動員在北伐時曾經一度在華南少數省縣實行，但效果不彰；北伐結束後迅速消弭，到了抗戰時期，重新被列為婦運主要路線。早在對日抗戰爆發的民國 26 年年底，蔣委員長在〈告國民書中〉即指示「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¹⁴ 在人口數的分析中，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 85%，按估農村婦女為其中半數。¹⁵ 因此當中央宣示中國抗戰的源泉在鄉村，鄉村中的婦女自然而然地躍居婦運的主要對象。若以全部婦女人口為母數，其中的絕對多數是農村婦女，其蘊藏潛力無窮無盡。如何擴大農村婦女的社會參與，並積極組織訓練她們為國家貢獻，成為戰時中國婦運亟待發展的園地。

配合中央動員農村婦女的政策，知識婦女將農村婦女大規模的帶進國家領域，既從事戰時集體服務，又進行個體改造。此種婦女工作最突出的莫過於靠近東南沿海前線戰區，又緊鄰後方未淪陷區的江西省。¹⁶ 江西省的婦運最高指導者曾經明確宣示，該省的婦運是朝著建立群眾基礎的方向努力。¹⁷ 贛省婦女領袖們，早在戰前的婦女工作經驗中摸索出一些新的基礎及方向。該省婦運於民國 23 年開始籌組，24 年逐步發軔，直至 25 年，省婦運最高指導機關「江西省婦女生活改進會」成立，奠定工作的基本規模。¹⁸ 主要的婦女工作人才從全國各地網羅而來，包括燕京

13 杜隆元，〈知識婦女對於當前婦女問題應有的認識〉，《江西婦女》，卷 1 期 6（1939 年 8 月 10 日），頁 4-6。

14 蔣總統思想言論集編輯委員會，《蔣總統思想言論集》（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6），卷 5，頁 66。

15 管梅瑢，〈婦女運動的新階段〉，《江西婦女》，卷 1 期 2、3 合刊（1939 年 4 月 10 日），頁 4。

16 陳榮華主編，《江西抗日戰爭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頁 270。

17 管梅瑢，〈婦女運動的新階段〉，《江西婦女》，卷 1 期 2、3 合刊，頁 5-7。

18 江西省婦運起於戰前，民國 23 年中央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該市婦女組織女公務員服務團，團員以知識女性為主，除女公務員外，包括留學生、中高等教育女性、

大學校友留美的王敏儀、管梅瑢、潘玉梅先後任該會正副總幹事，活躍的旅美留學生、北平香山慈幼院負責人熊芷亦受邀南下，擔任指導員。其他燕大畢業生水世瑋、邱雪娥、葉楚生等陸續抵贛加入婦運工作行列，其中燕大教授雷潔瓊政治立場較左傾，她亦應聘到省主持婦女工作幹部訓練。¹⁹ 贛省的婦女工作領導群，陸續有增添及退出者，較重要的幾位領袖，大致可分為與國民黨關係緊密者，如朱劍華、杜隆元、薛岩及管梅瑢，後者曾任新運婦指會總幹事；²⁰ 有所謂進步色彩較濃厚者，如雷潔瓊、高景之、魏媛、楊漱敏、陳青如等，還有一派立場較不鮮明，包括水世瑋、潘玉梅、熊芷等。事實上，隨著共黨力量在城市的式微，三〇年代以來政治力量已不再成為左右婦女工作的決定性因素。許多背景相異的婦運領袖在求大同去小異的前提下，多數能合作共事，不像北伐時期激烈的政治之爭連累到婦運的進行。就江西而言，婦運組成份子包羅各地的婦女菁英，從組織到工作開展的逐步推動，說明該省婦女工作實為脫舊創新的時代產物。

江西省婦女生活改進會的工作內容，已提升至針對省內所有婦女設計，其所闡明的會旨為「謀全省婦女具有健全之體格，公民之常識，生產之技能，治家育兒之能力，服務社會之精神，革除不良習慣，改善個

校長、中、小學教師、醫師、護士、圖書館員、黨務工作者、新運職員等，總之是一批女知識菁英。在社會上，她們帶入「服務」這個婦女新工作概念，緊密地與國家政策結合，女公務員服務團開啟後續江西婦女運動的先聲。民國24年冬，新運總會遷至南京，江西省另組江西省新運會，原有南昌女公務員服務團改組為「南昌市婦女新生活改進會」，隸屬於省新運會。該會提出的工作內容是「教育、生產、婦嬰衛生、社會服務」，著重婦女生活改良，說明了江西省婦女工作與新生活運動的呼應，既服膺中央婦運的目標，又注入從省出發的實際考量。與民國25年2月新運婦指會在南京成立後，其所提出的工作方向做比較，後者擴大到正當娛樂、節儉儲蓄、服用國貨、破除迷信等，餘者與江西省婦女工作目標大同小異。〈贛新運促進總會組織婦女服務團〉，《中央日報》（南京），1934年10月3日，張2版2，轉引自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頁291-292。

19 雷潔瓊，〈介紹江西省婦女生活改進會〉，《民國日報》（南昌），1937年11月23日。

20 〈本會成立之經過〉，《婦女新生活月刊》，創刊號（1936年10月），頁34。

人生活」。²¹ 民國 26 年後，婦運工作正式開始。初步擬出的幾項工作原則，包括注重群眾婦女；訓練時，質量要並重；不拘限市、縣、村的分別，工作可同時並進；以及不採救濟、慈善、施診態度來開展婦女工作等，²² 表現了該省婦女運動的戰時新理想。一方面不採消極依賴婦女自動參加的運動方式，另一方面掃除婦女工作只集中於少數人，多數婦女無從接觸，導致各種工作缺乏統合，不同團體做同樣的事，需要的事卻沒有人從事的缺失。以生活改進會在省會南昌著手試驗新婦女工作為例，該會舉辦南昌市保甲眷屬訓練班，為開前人所未有的新舉措，試圖從婦女這方面來締造效法男性的基層統治力量。該訓練將全市分成 10 區，每區設 1 班，分 2 期訓練，每期包括 5 班，每班訓練 32 小時，每星期訓練 2 小時，4 個月結業。這次針對保甲眷屬的普遍訓練，領導者對於該工作的評價是「似乎是能使工作影響更普遍一些」。²³

民國 26 年 6 月，星子、九江開始了縣級的婦女工作。兩縣屬最初開展的地區，因此宣傳及試驗的成份極濃，為此，訓練傾向效果立見的方式。譬如辦鄉鎮幹部訓練班，每鄉鎮遴選婦女 3 人，訓練 10 日，在訓練項目上著重精神、衛生、公民、秩序，即著眼於短期內能獲顯著改變。訓練結果令工作人員感到雀躍，本來散漫的農村婦女，結訓時舉行遊藝會，「會場秩序的維持，來賓的招待，臺上的主席、司儀、演講、演劇都是她們自己負責。會場安靜和有秩序，節目的按序進行，是在一般民眾大眾中不易見的成績」。²⁴ 幹部訓練後，九江成立了婦女指導處，並以工讀班作為該縣婦女工作的重點。星子則是建立工作中心區，於近中心區的各保設置了 16 個傳習處，將婦女識字列為主要任務。後因抗戰爆發，兩縣初萌芽的婦女工作不得不暫歇並作調整。

21 〈本會成立之經過〉，《婦女新生活月刊》，創刊號，頁 34。

22 管梅瑢講，〈江西省婦女生活改進會兩年來的工作總報告〉，《江西婦女》，卷 1 期 4（1939 年 6 月 10 日），頁 7。

23 管梅瑢講，〈江西省婦女生活改進會兩年來的工作總報告〉，《江西婦女》，卷 1 期 4，頁 8。

24 管梅瑢講，〈江西省婦女生活改進會兩年來的工作總報告〉，《江西婦女》，卷 1 期 4，頁 9。

七七事變後，因應國難當前，省主席熊式輝在該省抗敵動員會議上指示，江西婦女生活改進會當修訂工作目標，將婦女動員列為該會最主要任務。²⁵ 戰爭初期，以效率為考量的前提下，因勢乘便的作法應運而起。9月，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在星子縣，進行全縣總動員計劃，壯丁集中區署受訓5天。包裹於該軍事強制的壯丁訓練計畫下，星子縣中年齡16歲至35歲的婦女，亦被徵召於各保聯適中地點進行集訓5天，另外每保聯設一兵站醫院，各保聯內選擇40名能幹婦女充當看護婦。留宿醫院者施以整天的訓練，其餘婦女則每日集中訓練半天。這次訓練對後來的婦女工作有幾點重要啟發，第一，集中訓練的效力較大，婦女生活習慣的改良及對老師的信任因團體生活而加深；第二，召集婦女藉助縣政府及軍訓班本部的政治力量，強迫性質居多。這種強迫性，成了江西省婦女工作深入基層、召訓農婦最有力但也備受爭議的手段；第三，縣婦女隊的初步成形，隊長由工作同仁於訓練後在每保挑出2名較優秀婦女任之。²⁶ 星子縣的經驗，被擴大引用到其他縣，逐步調整成為能夠單獨運行的婦女訓練計劃。同年11月，在臨川縣的第二區區內，以保聯為集訓單位，每甲選1名婦女受訓，該區共有12個保聯，訓練分2期進行，每期7天，第一期結束後，舉行大檢閱，許多活動細節及表演項目由婦女自己策劃。檢閱典禮開放招待當地民眾，此舉轟動了全區，甚至廣為傳播至全縣。臨川的經驗呈現了短期訓練的效果，受訓後的婦女做起保的小領袖頗為自得，²⁷ 但更深刻的影響仍不明確。各縣婦女受訓的經驗尚屬分散，無法有一完整評估，特別因為戰局危殆，婦女工作往往將戰時服務列為優先。

26年12月，省婦女生活改進會召開了第一次工作人員講習會，參與份子是全體職員及部分新近招募的人員。會上議決組織江西婦女戰時服務團，計劃於各處招募30個女青年，訓練後組成戰時服務隊四隊，分赴

25 熊顧柏筠，〈江西婦女動員起來〉，《民國日報》（南昌），1937年11月23日。

26 管梅瑤講，〈江西省婦女生活改進會兩年來的工作總報告〉，《江西婦女》，卷1期4，頁10。

27 水世瑋，〈臨川婦女動員了〉，《民國日報》（南昌），1937年11月30日。

南昌蓮塘、臨川、星子、弋陽四地，擔任隨軍服務工作。結果第一、二、三隊順利達成組訓，各隊在傷兵慰勞的工作上表現出色，第四隊在弋陽召集不足 30 人，只好就現有人數進行 10 天戰時工作講習。結束學習後，學員分赴各區進行婦訓工作，方式是每保挑選優秀婦女 3 名集中區署訓練 9 天，3 星期內共訓練 5 百多名保幹部。這些保幹部回鄉後，向鄉人募捐食物送給南昌各醫院進行慰勞。²⁸ 弋陽的經驗極具參考性，省派下去的職員只有 5 人，她們召集當地的青年知識婦女來訓練，這些婦女受完訓後，分赴各保訓練農村婦女，其成效超乎預期。在地緣情結及方言溝通的優勢下，顯示中間階層應盡量拔擢本地人擔任，她們是上層與基層溝通最好的橋樑。另外，弋陽經驗還開啓了後來幹部訓練的濫觴，那就是各地工作的起始，必須將鄉鎮幹部的選取派任列爲首要。

民國 27 年 6 月後，贛北受到日軍突擊。九江、星子、德安、永修等大城陸續淪陷敵手，一時難民、難童人數遽增，紛向省內非戰區流散，省婦女生活改進會主持緊急的難婦安置及難童搶救工作。²⁹ 贛北與日軍激烈交火，爲堅持工作進行不輟，省婦女生活改進會由南昌遷至遂川。27 年 4 月，省務會議通過各縣市設立婦女指導處，³⁰ 縣級出現專責婦女工作的行政部門，這項舉措等於宣告縣及縣以下的地方婦女工作，能得到合法的政治奧援，此後贛省的戰時婦女工作逐步向基層深入。從縱的從屬關係來看，各縣婦女指導處受婦女生活改進會領導，由上而下、層層節制，上、中、下階層的婦女機構得以互相交流。各縣不同的農婦處境，由中層統合後遞交上層，透過大量的工作計畫、定期報告、調查分

28 小巖，〈婦女工作在弋陽〉，《江西婦女》，創刊號（1939 年三八節出版），頁 30-31。

29 贛省原有兒童保育會江西分會，熊芷、雷潔瓊及朱劍華等生活改進會的婦女領袖都是重要負責人。該會在南昌成立第二保育院，後因戰火波及，遷至永新。贛北戰事擴大後，戰區南昌、九江、星子、德安等流離的難童數遽增，九江又成立了臨時難童收容所。江西兒童保育會搶救東戰場大批難童，在經營規模及照護教育上都有顯著成績。朱劍華，〈一年來江西的保育工作〉，《江西婦女》，卷 1 期 2、3 合刊，頁 36-37。

30 周志方，〈抗戰時期江西婦女運動的回顧〉，《江西文史資料選輯》（南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80），輯 3，頁 175。

析及活動設計，省內婦女的大致生活情況有了初步的概觀分析及統計資料。³¹

生活改進會作為全省的婦運總部，為因應各縣婦女指導處成立後的人才需求，大量招募各處來省的流亡青年，27年後新職員人數倍增。³²基於新舊工作同仁需要交流，並且為了縣婦女工作的內容要有明確主張，該年6月召開第二次工作人員講習會。彼時擺在贛省婦運眼前的困難是婦女工作幹部不足、經費有限，又要在極短時間內見到成果，為此，只能在工作方法上反覆斟酌。講習會上，做成三個工作方法的建議：第一，著重運用政治力量，也就是依賴保甲制度來召集婦女，並且力爭婦女工作人員參加地方實質行政；第二，婦女工作人員要破除為權為勢的想法，雖列為行政人員，卻必須實行新作風。尤應注重吃苦耐勞及與大眾婦女同甘共苦，工作進行強調感化而非命令強制；第三，教育的技術必須講究，也就是要讓一般婦女能夠理解及接受。³³三條之中有兩條是求諸婦女工作人員自身的修養及能力，尤其是「服務」及「犧牲」成了抗戰時期江西省知識婦女下鄉工作，勉勵自己及同仁的共同守則，這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婦女共赴國難的新形象。伴隨著婦女工作所發揮的影響及獲得的成績，同樣鮮明的是一群知識婦女打造的苦難中國、堅毅女性形象，其核心是她們將自己拋入社會，在群體之中實踐個人價值。³⁴如同該次

31 生活改進會於民國28年4月10日舉辦第三次工作人員講習會，已成立縣婦女指導處的13縣提給大會的工作報告共計10萬字之多，大會將之濃縮摘錄出版。〈十三縣工作報告摘要〉，《江西婦女》，卷1期4（1939年6月10日），頁18-23。

32 全會至民國27年4月已增到70多人，陳榮華主編，《江西抗日戰爭史》，頁268。關於贛省投入婦女工作的知識女青年，究竟總人數有多少，無法確切得悉。原因有三，一、因各縣工作人員流動頻繁，變動太快；二、自民國27年至民國31年，五年之中，各縣設置婦女指導處的進度不一，難以統計；三、贛北有數縣淪為敵佔區，其中亦有知識婦女開展游擊區婦女工作，情況複雜，難有明確記錄。

33 管梅瑢講，〈江西省婦女生活改進會兩年來的工作總報告〉，《江西婦女》，卷1期4，頁12。

34 蔡維屏研究30年代的消費主義與個體性(consumerism and individuality)，指出日常生活中的實踐結合了國家與私人的欲望，本文所說的群體中的個人主義，參考這個說法，知識婦女的戰時作為，也是國家與個體協合的結果。Weipin Tsai, *Reading Shenbao: Nationalism, Consumerism and Individuality in China 1919-37* (New York:

工作講習會上，同仁彼此約定的十條工作守則，其中第七、八、九條分別是「男女工作能力是同等的」、「唯有站在大眾的立場才能取得大眾的信任」、「人類的幸福基於社會關係的平等」。³⁵ 贛省戰時婦運自發動之始，即傳達了知識婦女所追求的社會新面目，那就是將自身融入群眾中，忽視個別差異，並將戰前的男女平權轉成是男女平等，以盡婦女對國家社會的職責。戰時愛國精神的高揚造就齊一的婦女作爲，不僅超脫社會經濟的矛盾、城鄉的隔膜、年齡的分歧，最重要的是推倒戰前流轉於城市，飽含感官訴求的婦女形象——特別是連結到消費、享樂、自由戀愛等等作爲，與戰時緊張嚴肅的氛圍截然不相容。在輿論此起彼落地批判下，³⁶ 摩登婦女的魅力大爲褪色，取而代之的是迎合戰時艱忍奮鬥精神的樸實刻苦婦女形象。以江西省爲例，最典型的是婦運領袖之一的熊芷。她受省政府之聘到會主持婦女工作，外貌平凡樸素，終年一襲寬大藍布褂，整日忙碌不堪。抗戰爆發後，熊芷一人兼任數職，包括江西省婦女抗敵後援會的總幹事、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委員、各界抗敵後援會慰勞工作團團長及傷兵管理委員會慰勞課課長，不分晝夜投入抗戰工作中，在公事負擔下，仍然注重家庭事務。她是空軍軍人配偶，育有五名子女，輿論稱譽她是開明的主婦。³⁷

崇尚個人努力以克服一切阻難，可謂是贛省婦女工作一開始的寫照。在缺乏過去婦運經驗的傳承，又沒有豐富的方法與材料的情況下，一切仰賴婦女生活改進會派出去的工作人員，她們在各處努力摸索，開展婦女工作的基礎。熊芷意味深長地提示婦女工作者：「過去無現成的辦法，給我們做效，我們要一件件一樁樁，自己來研究，來創造，所以就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10).

35 管梅瑢講，〈江西省婦女生活改進會兩年來的工作總報告〉，《江西婦女》，卷1期4，頁12。

36 省主席熊式輝即公開指責時髦小姐、摩登太太，單純祇知吃飯不做工，是亡國的現象，是婦女本身的恥辱，難道婦女就是天生的低能，應該自暴自棄的放棄自己的職責而倚靠他人嗎？〈熊主席訓詞〉，《江西婦女》，卷1期4（1939年6月10日），頁6。

37 〈婦女生活介紹——熊芷〉，《民國日報》（南昌），1937年11月23日。

不得不多用時間，多用大家的腦力體力，來逐漸的試驗著進行」。³⁸ 顯見即使將婦女工作正式納入行政系統中來進行，同仁的能力依舊決定著工作進行的順利與否，正所謂「成績是工作的累積，能力是經驗與學習的產物」。³⁹

陸續成立婦女指導處的各縣，⁴⁰ 主任擔負重要的領導與教育責任。她們是地方婦女工作的實際主持者，大部分與農村沒有深厚根源，彼此之間卻有非常多類似的背景及出身，其中很大比例是熱忱十足、經驗毫無、年輕識淺的女青年，以致工作的挑戰就不只是從無到有地建置，連帶最基礎的待人處世也需細心學習。一位主任說到人事棘手的問題，一旦到任後，便須接觸黨政長官、救亡團體、廣大民眾等。更進一步分關，地方上的各色人等，諸如富有聲望的地方士紳、持反對立場的頑固人士、黠靈多疑的小人、質樸老百姓，甚至細膩的太太小姐皆須照應；再者，過路入境的長官也不能疏忽；而最重要的是時時關注工作對象的問題，即所有熱望待拯救的婦女大眾。⁴¹ 人事問題上，最難拿捏及掌握的是工作上有直接關係的縣長。有主任反應縣長態度不親和，據悉，不乏小事而得罪縣長者。如何接受指導，又能發表自己的正當意見，成為許多主任進行工作時不能忽略的關鍵。一位主任建議，不應每件瑣事都去麻煩縣長，問長談短讓人生厭，最好能察顏觀色，伺機說明，每做一件事情不僅要得到縣長的同情和支持，並且須講求手續，行政管理上的往返公事案卷絕不可馬虎。⁴²

38 熊芷，〈縣婦女指導處主任會議閉幕詞〉，《江西婦女》，卷2期2（1939年10月10日），頁14。

39 熊芷，〈縣婦女指導處成立一週年勗同工〉，《江西婦女》，卷1期6（1939年8月10日），頁2。

40 到民國27年8月左右，江西省12個縣弋陽、貴溪、上饒、浮梁、安義、豐城、吉安、泰和、遂川、南康、瑞金、南城先後成立縣政府及婦女指導處，動員了約略七萬婦女，在規模上講算是中國各省首位了。熊芷，〈江西婦女工作之展望〉，《江西婦女》，創刊號，頁3。

41 〈縣婦女指導處主任經驗集，在艱苦的工作中來鍛鍊自己〉，《江西婦女》，卷2期2（1939年10月10日），頁24。

42 〈縣婦女指導處主任經驗集，在艱苦的工作中來鍛鍊自己〉，《江西婦女》，卷2

除對上的縣長問題外，最困擾主任的人事糾葛，莫過於如何處理同僚關係、帶領同仁從事婦女工作。一位主任建議道，對待上層工作同仁，以工作效率為改良，注意她們生活的合理性，可以發動集體生活來健全每一個人、約束每一個人；計畫及討論時採民主集中，共同領導、個人負責，藉此以提高每一個人的責任心與工作興趣，並且要謹遵按能力分配工作，既經分配，就要相信她們的能力，但要限期檢查，有困難及缺點要儘量幫助，以原則性的方式提出批評，或詳細解釋，絕不要代她們做。⁴³至於中間幹部，主任須調整態度，絕不可高高在上，要友愛公正，要注重學習。爲了提高幹部素質，主任在縣城裡，要多多搜集書報，摘錄要件並作詳細報告，廣泛分配給幹部閱讀，並切實執行讀書、筆記與作報告。此外，幹部難免良莠不齊，要抓緊一兩個比較好的，讓她起核心作用，凡事由她們提出，比主任提要好。⁴⁴

在群眾動員上，主任起著示範作用。與其他民眾交往要留心。主任的職位在縣城裏，太太小姐們是極看得起的，應該以這樣的身份和她們多交往，對士紳也要多拜訪，徵求意見，解釋工作，一個提案在提出前最好和有關係的人談談，他們明瞭後，較不會拒絕。對於工作對象的一般婦女大眾，要做到盡量不脫離，親身下鄉巡視，盡力幫助婦女是推動工作的必要作法。⁴⁵

總括來看，縣婦女指導處主任的任務在於彌補行政程序之不足，作爲贛省婦運起步的前緣指揮者，主任的工作包括計劃、應酬、籌錢、當文書、當會計，也要當書記、會寫會講，還要接近群眾。⁴⁶主任的得失幾乎成了婦女工作成敗的關鍵，如此依賴「人」的工作方式，似乎說明了抗

期 2，頁 25。

43 在縣婦女工作領導上，極為強調民主集中的作風，其內涵是凡事開誠佈公的商討，有缺點要誠懇指正，有過失應諒解。一個指導處如同一家人，要精誠團結。熊芷，〈縣婦女指導處主任會議閉幕詞〉，《江西婦女》，卷 2 期 2，頁 15。

44 〈如何處理內部人事問題〉，《江西婦女》，卷 2 期 2（1939 年 10 月 10 日），頁 31-33。

45 楊漱敏，〈如何從工作教育基層幹部〉，《江西婦女》，卷 2 期 6，頁 19-20。

46 〈縣婦女指導處主任經驗集，在艱苦的工作中來鍛鍊自己〉，《江西婦女》，卷 2 期 2，頁 24。

戰婦女運動的一個難以克服的工作瓶頸，所謂人亡政息即有可能始終是婦女工作潛在的危機。好的方面，優秀的知識青年婦女走入農村，創造一股前所未有的婦女工作規模；壞的方面，即一切都處於試驗、學習與改進階段。在制度尚未確立、行政效率不彰的情況下，幹部就成了婦女工作的真正要角，她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成了贛省婦運的全部成就。一縣之中，各類社會群體皆存在，她們需注意縱的上下溝通，以及橫的平行團結合作。各縣主任的行動，在沒有太多包袱及陳規的束縛下，展現出其他官僚機構未有的新氣象。她們多半任勞任怨並且具備服務精神，⁴⁷彼此之間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可謂為奮發向上的新氣象，它渲染於戰時知識婦女之間。

知識婦女的新氣象，尤其展現於開會的集體活動中。民國28年4月，江西省的婦女工作邁入擴展時期，已成立婦女指導處的13縣與即將成立婦女指導處的8個縣，共二十多縣的工作人員齊赴遂川開會。大會紀錄了將近10天的會場情況，除掉必要的工作報告、提案討論等會議議程外，日常生活各方面都顯示知識婦女所建構並追求的共同價值。大會設有生活管理委員會及娛樂委員會，晨起、晚睡都有時間規定，其他還有課間休息，包括討論會、藝文活動、遊戲、自修以及晚飯後的自由交談。總之，除了工作之外，共同生活的樂趣為與會者所津津樂道，同樂會與聯歡會因寓工作於娛樂之中，尤其受歡迎。會議進程中嚴肅又不失輕鬆的氣氛，助長了同仁間親密的工作夥伴關係，大會紀錄的結語中寫到，臨到最後一晚的送別，大家沒有依依不捨的別愁離恨，有的是勇敢的誓詞，興奮的口號，深摯的友情。⁴⁸

個體的行動無異是申張群體共同凝聚的價值及理想，這是貫穿江西省戰時婦女運動中的核心趨力。誠如該省婦運領袖之一的管梅瑢曾說：「我以為要達到偉大的新階段必須有嚴密的組織，而這個嚴密的組織，

47 在薪資上，指導處的主任領有一定的待遇。不過，她們幾乎無一不是將之先墊付縣處的種種花費上，債臺高築已是常態。嘉，〈縣主任會議簡報〉，《江西婦女》，卷2期2（1939年10月10日），頁19。

48 薛岩，〈大會剪影〉，《江西婦女》，卷1期4（1939年6月10日），頁36-40。

必須是以個人為單位，建築在許多個人身上的，而不是建築在若干個沒有群眾基礎，或是彷彿有群眾基礎的婦女運動團體機關上的」。⁴⁹ 總之，寓個人與群體之中，頗能說明中國對日抗戰下的婦運所具備的時代特徵。

三、組織與活動：知識婦女對農村婦女的組訓

省婦女生活改進會召開的第二次工作人員講習會，確定了婦女組訓的辦法，即訓練、組織、活動三部曲，其中訓練之下再分為小三部曲，分別是幹訓（鄉鎮隊附訓練）、普訓（班長訓練）、隊訓（隊長訓練）。鄉鎮幹部訓練是每鄉（鎮）選一優秀或受過相當教育的婦女，訓練 10 天，然後助理普訓工作，成績好的選任為鄉鎮隊附。普訓是每甲選出優秀婦女 1 人，集中在鄉（鎮）內適當地點訓練 7 天，成績及格者充任班長。隊訓是在普訓婦女中，每保挑選優秀者 1 人，集中區署或適宜地點，訓練 10 天，成績及格者任保隊長。當三種訓練完成後，即行組織婦女隊及成立各級隊部。⁵⁰ 各縣皆以保隊作為婦女隊的活動單位，基層幹部包括保隊長、隊附、保隊內各股股長及班長等，皆從受訓合格婦女中選任。婦女隊建立後，即開始各股活動，主要有四大類項，分別是生計、衛生、教育及戰時服務。⁵¹

婦女組訓實施辦法確定後，縣婦女指導處的工作有了法令依據，各縣以下的工作步調趨向一致，體制亦較確定。按各縣指導處除主任外，

49 管梅瑢，〈婦女運動的新階段〉，《江西婦女》，卷 1 期 2、3 合刊，頁 6-7。

50 婦女隊和壯丁隊一樣，是依據保甲制度編組，縣婦女隊、壯丁隊與少年團合組為戰訓總隊。區有區隊、鄉（鎮）有鄉（鎮）隊，保有保隊，甲設班。區隊附是總隊長選派，由省婦改會訓練，鄉（鎮）隊長由鄉（鎮）長兼，鄉（鎮）隊附由受訓合格婦女充任。杜元隆，〈十年來的江西婦女工作〉，《贛政十年》（泰和：江西省政府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印行，1941），頁 2-3。

51 江西另外一份針對農村婦女幹部發行的刊物，特別針對婦女隊有較白話性質的介紹。「江西的姐妹們要努力種田織布，做營生，要新法育兒，講衛生，要知書識字，明道理，要徵募慰勞，齊抗戰，全江西的姐妹們作愛國愛家有用有為的人」。江西省婦女指導處編印，《農村婦女》，缺期數（1940 年 3 月 8 日），缺頁數。

必須設置 2 至 3 位指導員。因婦運人才需求孔急，省府乃著令江西地方政治講習院舉辦婦女幹部訓練班招收女青年，訓練後派往各縣任職。⁵² 地政院訓練出來的一批知識女青年，其職務位列主任之下、各基層幹部之上，她們稱呼彼此為「同工」，是贛省下到基層工作的先鋒。同工的工作方法，共同具備的特點是女權主張溫和、組訓態度堅決，在不凸出婦女解放意識，不誘發社會動亂的前提下，知識女青年發揮因地制宜的能耐，普遍都算得上是披荊斬棘的開路者。工作的艱難是因為一切都要身體力行，即使具有行政職銜，她們的性別及年紀降低了該有的威望，比起那些在地方盤踞已久的基層官僚，同工可謂職權俱無，如何樹立自身工作的群眾接受性，成為一大挑戰。誠如熊式輝主席對工作同仁的勉勵之語所提示的，「你們不是作女官，不能用發命令出佈告的方式去做工作，你們雖是政府所派遣的人員，但性質卻是『教習』」。⁵³ 江西省的婦運事業大部分都是從頭做起，在初行婦女工作的地區，百餘名工作同仁任勞任怨並且事事躬親，不少人日曬雨淋、日夜奔走於廣大散居農村中，積勞成疾，因公殞命者不乏其例。⁵⁴ 下到縣裏後的工作，可謂千頭萬緒，各處環境不同，同工應變方法亦隨之各異。一位贛省婦女工作者提到：

我們應當瞭解婦女工作不是開一個科學研究會，更不是開學術討論會，而是千千萬萬的富於自覺性的婦女幹部，經常在堅苦的工作崗位上作長期鬥爭，在我們工作部門裏最寶貴和最有決定意義的乃是人才，乃是幹部。⁵⁵

52 許多流亡的知識女青年有志於婦女工作，便循江西省地方政治講習院管道，經過培訓後，分赴各地任婦女幹部。一位從講習院畢業的女學員，民國 27 年 7 月 15 日到南城，8 月 1 日主持該縣婦指處成立，她依照地政院所學，擬就一份婦女組訓計劃面陳縣長，其後一年間，完成了縣境內鄉鎮、區、班長各級幹部訓練，並陸續展開教育、衛生、生計、戰時工作四項社會活動。傅舜華，〈南城一年〉，《江西婦女》，卷 1 期 6（1939 年 8 月 10 日），頁 20-22。

53 熊主席的勉勵是針對江西省婦女生活改進會召開的第三次工作人員講習會與會幹部，〈熊主席訓詞〉，《江西婦女》，卷 1 期 4，頁 6。

54 熊芷，〈江西省婦女指導處的成立〉，《江西婦女》，卷 2 期 1（1939 年 9 月 10 日），頁 2。

55 彭志明，〈怎樣培養鄉村婦女幹部〉，《江西婦女》，卷 2 期 2（1939 年 10 月 10

當工作同仁派赴到各縣進行工作，召訓婦女群眾是她們最先遭遇的挑戰。一位同工寫到她到陌生的縣份去準備工作，當地謠傳「幾個女兵要來抽女壯丁」，⁵⁶ 致使多數婦女躲避不出，工作無法推進。同工們檢討工作障礙，歸因是女子穿著軍裝在地方上引起恐懼，遂改換長袍、挨家挨戶訪問，放低姿態以博得同情及瞭解，接著，嘗試開辦小型幹訓班，班中女青年學員 10 多人，係訪查各學校召募而來，她們被集中起來訓練 12 天，終訓時，學員們學習了工作方法並且滿懷熱情，老師、學員議決合力籌辦一個當地前所未有的結業典禮及遊藝會。當天，專員、縣長等受邀出席訓話，生平罕能接觸官員的女學員們，見到縣長官員，異常興奮。晚間舉行遊藝會，來了 1 千 3 百多個老百姓，盛況出乎意料，婦女幹部的訓練成果讓縣長及當地士紳印象深刻，由此而得到更多信任及同情，婦女工作跨出第一步。其後，更深入的組訓順利展開。

普遍說來，動員農村婦女極爲不易，一般婦女除家務外，還有兒女牽制，贛南部分地區婦女必需參加農事，下田耕種、挑擔砍柴等等都做。整體而言，家庭貧困是農婦共同普遍的境況，終日爲生活勞碌者多，有空閑的青年婦女極稀罕，要抽身受訓，談何容易。再者，農婦文化低，封建思想及傳統觀念牢固不可破，家庭被她們視爲與外界隔絕的生活單位，尤其公婆及丈夫一般都反對婦女受訓：一來出門期間缺人手，難免連累丈夫及婆婆增加家事負擔，二來年輕婦女脫去家庭約束可能生出反抗之心，最好關在家中，養育孩子、服侍丈夫。這些或大或小的阻力及林林總總的牽制，使農婦不甚樂意於出外受訓。少數富戶婦女則是另一種情況，她們自小耳濡目染，認爲有身份地位的婦女拋頭露面不光彩。⁵⁷ 總而言之，農村中不論貧富，對於受訓容易引起家庭糾紛，有著共同的疑慮。工作同仁如何靈活應變地將婦女從家庭拉進訓練班，是組訓成敗

日)，頁 27。

56 楊理，〈從沒人沒錢中開展工作〉，《江西婦女》，卷 2 期 2（1939 年 10 月 10 日），頁 29-30。

57 這是婦運領導人雷潔瓊下到農村工作後所得的一般評價概論。雷潔瓊，〈江西怎樣組訓農村婦女〉，《江西婦女》，創刊號（1939 年三八節出版），頁 6-7。

的關鍵。有些同工以辛勤下鄉、聊天閑談來接近農婦，⁵⁸ 有些採取逐一家訪來建立彼此間的聯繫，⁵⁹ 也有幫農婦解決日常困難者，如治療疾病、教育她們的子女。⁶⁰ 總之，先取得好感，才能進行更一步的組訓。

農婦受訓，算得上是基層民眾編練的一環，因此任何一地招收合格婦女來訓，大概都無法繞過保甲長。一般說來，保甲長代表國家收租稅、徵兵，其任務本就不受歡迎，又因在其位者往往不是由群眾推舉，多數被土劣把持，惟利是圖、營私舞弊層出不窮，加以保甲長不易接受新觀念，在政令的推行上無積極性，導致群眾與保甲長往往處於對立的位置。⁶¹ 婦女工作既依賴保甲長，難免連帶受到腐敗保甲長之累。當召訓的命令下到基層，許多保甲長承擔集合婦女的工作，不可否認在初行婦女訓練的農村，行政強制是必要的協助，⁶² 不過各類弊端也難以避免。有保甲長以隨便敷衍態度應付，一保之內合適的婦女未必被召；相反地，較弱勢的一群，如老的、沒錢沒勢、家中貧困的婦女易遭欺壓被強迫召來。結果是各地不時傳聞婦女們的不滿、疑懼，許多人不明就裡，有些謠傳以為召訓是抽女兵，地方上便有婆婆哭哭啼啼地帶著媳婦前來抱怨，說兒子已經去當兵了，媳婦竟也要當兵。⁶³ 光怪陸離的現象層出不窮，有說是要婦女幫助打仗、服侍傷兵，有人為此避往娘家、甚至逃入山裏。保甲長受賄舞弊、買人頂替也時有所聞，包括不依受訓婦女資格標準的規定，挑選不合條件的孕婦、產後乳兒者，以及患疾、殘廢等以為敷衍。婦女憤恨保甲長的不公，但礙於無法規避，到訓後對工作同仁既恐懼又

58 傅舜華，〈南城一年〉，《江西婦女》，卷1期6，頁22。

59 婦女指導處，〈吉安七個月來的工作〉，《江西婦女》，創刊號，頁35。

60 艾萍，〈豐城婦指處一周年〉，《江西婦女》，卷1期6（1939年8月10日），頁18。

61 保甲長制度是由上而下權力系統中的政府基層行政設計，夾在地方紳權及政府權力角力之下，缺乏政治實權，因此往往由地方上平庸之人出任斯職，沒有權力復出身平庸，做的事情又瑣碎，導致保甲長普遍風評不良。胡慶鈞，〈兩種權力夾縫中的保長〉，收入費孝通等著，《皇權與紳權》（上海：觀察社，1948），頁130-139。

62 孫劍秋，〈動員農村婦女與行政基層機構〉，《江西婦女》，卷1期5（1939年7月10日），頁11-13。

63 水世瑋，〈臨川婦女動員了〉，《民國日報》（南昌），1937年11月30日。

怨懟，認定她們與保甲長是一丘之貉，怪責其無事生非。⁶⁴ 更壞的情況是保甲長站在反對的社會人士一邊，從中做梗處處威脅著婦女工作的開展。婦女運動本就易於引起農村男子的敵意與偏見，即使贛省省府已明令將婦女運動列入行政體系，士紳、保甲長依舊認爲婦女工作是愛出風頭的婦女們時髦的玩意兒，是破壞家庭、招搖是非的事。種種輕視及惡意，衍生了保長毆打婦女隊隊長的事件。⁶⁵ 總之，地方政治的良窳左右著婦女工作。

待召集的工作告一段落後，工作同仁還必須釐清在一大群龐雜的婦女群眾隊伍中，各式各樣存在於農婦間由來已久的階層矛盾。首先，家庭經濟條件好壞、教育程度高低，衍生婦女彼此間的敵意與偏見，中上階級婦女看不起貧困婦女，不願與她們共同學習。此外農村封閉排外，同一保婦女往往聚集一起，不樂與他保婦女來往。學員間的分歧，處處構成訓練的挑戰，工作同仁須想方設法地適應農婦學員。正式開訓後，各種難題依舊層出不窮，最主要的是學員能力程度參差不齊。教育程度好的學員，學習意願強，對於太淺的教導不感興趣；教育程度差的，多半家庭負擔重，⁶⁶ 學習興趣低，對於稍深的教材難以明瞭，因此教學者就須在內容上謹慎拿捏。其次，教學手法要活潑，農婦不識字者多，加以缺乏耐性，教材便要多用圖畫、少用文字、淺白易懂、少提論理，訓練農婦的技巧與成效，雖與農婦集體素質有關，但更大部分取決於婦女工作同仁的工作熱誠及下到農村後的適應力。

基層婦女訓練的時程極短，鄉鎮幹部訓練、普訓及隊訓分別是 7 天、10 天以及 15 天左右。在如此短暫的時日中要學的東西太多、課程太急迫，成員往往消化不了，要從稱得上是生吞活剝、半生不熟的訓練學員中，挑選合適者充任班長、保隊長及鄉鎮隊附等基層幹部，⁶⁷ 只能憑藉

64 孫立，〈組織鄉村婦女中的幾個問題〉，《民國日報》（南昌），1938 年 4 月 13 日。

65 雷潔瓊，〈江西怎樣組訓農村婦女〉，《江西婦女》，創刊號，頁 8。

66 農村流行早婚，農婦受訓的成效與其家庭各種處境關係緊密。雷潔瓊，〈江西怎樣組訓農村婦女〉，《江西婦女》，創刊號，頁 7。

67 鄉隊附及區隊附直接受命於上層幹部，同時接觸群眾及下層幹部，屬於中間階層，一般是學歷較低的女青年，出身本籍，她們是戰時江西新挖掘的「地方型知識婦

工作同仁的慧眼了。有些工作同仁建議，選擇基層幹部時不能在知識上要求過高，只要注重能力及情感兩方面。能力是指工作熱忱，要在艱苦工作環境中不怕負責任、不輕易動搖；至於情感，則是側重當地群體之中具有相當信仰及聲望，深悉當地婦女處境及需要者。這兩種幹部較能被廣大農村婦女認定是她們自己的領袖，可見群眾的信任很重要。幹部挑選只是初步，必須加以輔佐指導助其勝任職位。總之，幹部培養往往都在結訓後，才算真正開始。

培養幹部須經一段細膩的過程，有經驗的工作同仁總結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寓訓練於工作之中。在結訓之後，接著進行各保婦女隊編組，這項組訓的基本工作，考驗工作同仁領導的幹部訓練，其階段性進程能否順利進行。農村的保甲制度行之有年，卻未必各處都有詳實的戶籍登記，一旦戶口調查不確實，便無法掌握保中適齡婦女人數。逢此阻礙，婦女隊編組即須延擱，轉而協助敦促保甲長先行戶籍調查，然後才能造一全保適齡婦女名冊，曠日費時自不待言。此外，鄉居村落分布零散，一個保可包括數個村莊，彼此相距3里甚至5里，將距離遙遠散居各村的婦女編成一隊，在集中上誠屬不易。外在環境的困難須一一克服，基層幹部卻幾乎無用武之地，大部分缺乏獨立工作能力，茫然不知如何著手；有些稍有能力者，偏偏臉皮子薄，聽到別人背後譏諷「保甲婆」，就退縮不前。⁶⁸一位工作同仁感嘆到：

一個人在一個廣闊百方里的地區中活動，忙得像走馬燈一般，顧此失彼，剛在一保工作得有點頭緒，又不能不跑到別的保去安置一下，等回頭的時候，這保工作已經冷卻了，終不能使工作生下根來，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真恨是分身無術啊。假如我們注全力在一保，婦女的心理又怪得令人生氣，她們活動是要看著別人的，若別保婦女未動，只叫她們動，

女」。至於普訓及隊訓結束後，提拔出來往往是保隊長及班長，她們一般是群眾出身，文盲不少，可謂是真正的農婦幹部，她們與上層隔著較多行政層級。熊芷，〈江西婦女工作之展望〉，《江西婦女》，創刊號，頁3。

68 雷潔瓊，〈江西怎樣組訓農村婦女〉，《江西婦女》，創刊號，頁7-8。

她們就覺得像受了壓迫，一定要掙著不肯動。⁶⁹

各縣工作的同仁編制極少，實在無法一保一保地切實指導，許多人不免有力不從心之感。

基層幹部的訓練及培養，始終是贛省婦女工作最主要的核心。由訓練而產生組織，組訓互相加強，各種婦女活動才能發動、生根。一位婦女工作同仁語重心長地說：

要使婦女工作質量同時進展，必須有力足氣壯的幹部作推動機、發酵菌。在婦女群眾中起基層作用的是婦女隊的各級幹部，她們自己在接受教化，同時也去教化別人，她們進步、堅強起來，能夠執行上級付與的使命，我們的工作才能有所付託。⁷⁰

同工之於基層幹部的關係，不能一味地看做是由上而下的指揮，它更趨近於一種平行的夥伴。一位指導員曾以「教而化之」、「風而動之」來說明，⁷¹ 形容頗爲貼切；另一位同仁則在詳細解釋該如何對待基層幹部時指出，「隊、班長是保甲裏的核心，也就是推動工作的輪盤，爲使保隊長、班長能在群眾裡面活躍起來，便須宣導鄉隊附在各該鄉鎮領導活動時，要求不能過高，要求過高，結果便使幹部厭惡，群眾逃避。」⁷²

民國 28 年，最先成立婦指處的二十多個縣，⁷³ 在經過近一年的工作佈置後，農婦訓練的成果報告紛紛出爐。由於農村婦女長久以來處於政治及社會隔絕的狀態，有計劃地加以引導後，部分婦女有了顯著轉變，似乎不足爲奇。在工作同仁的各種報告中，改頭換面、脫胎換骨的農婦成爲各縣工作成績最集中描寫的對象。一份來自南康的報告，提到第二

69 雷潔瓊，〈江西怎樣組訓農村婦女〉，《江西婦女》，創刊號，頁 8。

70 熊芷，〈江西婦女工作之展望〉，《江西婦女》，創刊號，頁 3。

71 熊芷，〈江西省婦女指導處的成立〉，《江西婦女》，卷 2 期 1，頁 2。

72 〈吉安婦女指導處七個月來的工作概況〉，《江西婦女》，創刊號（1939 年三八節出版），頁 36。

73 二十縣是吉安、新淦、安福、泰和、興國、遂川、贛州、大庾、南康、瑞金、寧都、南城、光澤、臨川、豐城、上饒、貴谿、弋陽、鉛山、浮梁。《農村婦女》，缺期數（1940 年 3 月 8 日），缺頁數。

區的婦女組訓，抵達一個叫做胡頭墟的小鎮，當地共九保二甲，經過全面調查後，唯一符合資格須集中受訓者是當地富戶家中的李氏少奶奶。當工作人員登門拜訪時，該富戶推說媳婦李氏有暗疾故拒絕受訓；消息傳出後，同保婦女大感不公，揚言拒訓，不得已央請鄉長出面調解，反受富戶詈罵，聲稱告到縣府也不怕。最後，縣指導處主任親自出面向富戶詳細解釋，並和顏卑辭地剖析，李氏一人不來影響全體利害，受訓生活沒有威脅，且充滿樂趣。富戶終於應允，但附加許多條件：包括不能上操、不能上樓、不能睡樓板、每天去醫院看病一次。當富婦李少奶奶一步一拐、百般不願地出現在班中時，擺出的是一副踞傲臉孔，她不僅輕視一起受訓的其他學員，認為她們是鄉下婆子，也看不起老師，把她們當成流浪的歹人。經過一段時間，李氏看著其他婦女唱歌、遊戲、上課，感受到老師的辛勞、認真，漸漸地不再排斥集體生活，甚至向主任坦白自己過去的生活太孤單、太不問世事、太享樂、太自私。到了結業典禮那天，李氏早沒了入班時的冷淡，而是一副新的神情。典禮上，她向臺下幾百人開講，講受訓的好處，雖然言語生澀，卻令人印象深刻。結訓後，工作同仁有意提拔李氏為鄉隊附，可惜礙於身體的暗疾，只好作罷。⁷⁴ 南康另一個例子的女主角，則是一位頑固鄉下老太婆。她的媳婦是該甲唯一合格的婦女班長，但老太婆總是不答應讓媳婦受訓，經過工作人員再三不懈的勸說，總算說動了一老一小，讓媳婦入了班。此後，老太婆會自動跑到班上去幫忙管秩序，還會對老師提出的問題搶著回答。結業那天，老太婆因看不慣羞答答的青年婦女被老師點到後，還低頭紅面不肯上臺，便自告奮勇地衝上臺，意外地給了參加訓練的正式學員莫大的鼓勵。⁷⁵

在知識婦女的描述中，農村婦女受訓前後的改變極具戲劇性，主要原因在於工作同仁的報告內容，往往不是平鋪直述的量化統計，多數更接近報告文學的體裁，以至於真實與推測夾雜於字裡行間，堆積出的農

74 羅光纓、張曉蓉、尹洪棟，〈班訓的困難及欣慰〉，《江西婦女》，卷2期2（1939年10月10日），頁34-35。

75 羅光纓、張曉蓉、尹洪棟，〈班訓的困難及欣慰〉，《江西婦女》，卷2期2，頁35-36。

婦形象不免趨於同質性高的刻板典型。舉例而言，淪陷前的南昌曾舉辦盛大的三八節紀念大會，臨近該市的三縣，貴谿、弋陽及新建派出農婦代表與會，其中已受一年訓練的弋陽婦女代表陳翠花被安排上臺講話，在場的文字紀錄者寫下如此的印象：

這位有著鄉巴佬神氣，穿著笨重棉襖，皮上盡是勞苦積痕，眼角有幾分強悍氣的女子，一開口就引來大笑，但隨後報告她自己去年連自己是那一個人都不知道，今天可以上臺報告弋陽募捐、開荒田、慰勞等工作，她激動地說著從前婦女是被壓迫的，現在已經好多，所以我才有機會代弋陽婦女的表來開會，講完，會場響起熱烈掌聲，大家驚訝一個農婦竟可以懂這麼多事。⁷⁶

另外一個類似的描寫，來自遂川工作同仁的報告。農村女子何生鳳是遂川幹訓班學員，最初見到工作同仁下鄉召訓，快速地逃走躲避，躺在床上裝病。工作同仁直趨其家中，明知她是剛剛跑走的女子，也不講破，還給她免費送藥、擦背撫胸，慢慢地卸除何氏原來強烈的戒心。其後，爲了說動何氏丈夫准允妻子入班受訓，同工甚至寫下保書。入班受訓後的何氏，起初東西亂堆、衣服放在枕頭底下，被同學批評不合臥房公約，她則不服氣地回嘴，完全一副自私、斤斤計較、愛相罵、膽小愛哭的村婦模樣。其後何女與受訓學員共同生活，經過大家的規勸、教育、批評及幫忙，以及老師的熱心協助，在集體紀律的薰陶下，個人態度漸漸改變，她能上臺講演了，小組討論會也主動發言，洋溢自信神情和學習精神，當別人指正她生活的壞習慣，如亂吐痰及拋紙屑等，何女都能虛心接受。結訓時，聽說學員要歡送志願兵的消息，她因有機會出力而興奮地在夜裡難以合眼。⁷⁷

農婦本人是否完全明白自身改變的過程，並且賦予這種改變「時代」

76 高景之，〈南昌的三八節〉，《江西婦女》，卷1期2、3合刊（1939年4月10日），頁48-49。

77 凱，〈何生鳳——遂川幹訓班成員〉，《江西婦女》，卷2期2（1939年10月10日），頁43-44。

的意義？綜觀知識婦女所提供的工作報告，多半屬於從旁記錄，其所描繪的農婦轉變，有可能夾雜農婦自身的聲音，但更多部分是工作同仁擷取的印象。解讀工作同仁筆述的各類關於農婦受訓前後的記錄文字，發現其共有的傾向是將農婦納入一個去舊染新的對照框架中，其內容或許不注重呈現農婦真實樣貌，更大成份是用以證明工作同仁投入工作的心血。當同工心中擬想的農婦理想形象，最終與某些個體充分疊合後，投射了工作同仁對於自身工作的肯定。問題是對農婦而言，她們受訓後的改變是否真的貼近工作同仁所感受的那般煥然一新？有些資料披露，農婦在受訓後、當上幹部，地方人士親眼目睹「女人也能做家庭以外的事」，便收起了賤視的態度；⁷⁸ 還有少部分婦女當上鄉隊附，領有薪酬，家庭中婆婆、丈夫也就另眼相看。⁷⁹ 顯然，受完訓、回到原有生活秩序中，得到他人的稍許善待，對農婦而言，是最實際的報酬。或許，由受訓而來的轉變，在農婦現實生活中是各種新奇經驗的增添，稱不上是新生活或新生命的萌芽。

縱觀江西省基層幹部組訓工作，培養了大批群眾婦女加入工作，整體婦女戰時動員，試圖以本地人管本地事的方式，極力發掘下層婦女充當基層幹部。儘管這是一種較具彈性的婦女工作方式，卻免不了複製知識份子、行政當局對農村的觀點，⁸⁰ 表現了文明殖民的傾向。⁸¹ 從知識

78 雷潔瓊，〈江西怎樣組訓農村婦女〉，《江西婦女》，創刊號，頁10。

79 鄉隊附月薪5元，縣婦女指導處每月辦公費只有18元，相對而言，算是不錯待遇。勁韋，〈主任會議剪影〉，《江西婦女》，卷4期2（1940年10月10日），頁18。

80 農婦動員連結到農村家庭，而農村家庭改革又是整個國家對於農村現代化的基礎工作。就如同江西婦運領導人之一的雷潔瓊解釋說，動員農村協助抗戰，乃是抗戰勝利最重要的保證，而動員農村的先決問題，要建設現代化的農村，增加農民的生產力，提高農民的文化水準，消極的減少農民被剝削被壓迫的痛苦，積極的使農民能享受較豐富的生活。改進農民生活，當先改善農村家庭生活，其手段莫如從改善婦農村婦女地位入手。雷潔瓊，〈農村婦女地位研究〉，《江西婦女》，卷1期6（1939年8月10日），頁7。

81 民國28年的三八節前後，熊芷曾公開指出從事江西省婦女工作，首先要考慮婦女有害的生活習慣的革除。如纏足、懶惰、骯髒、迷信、愚弱、女人虐待女人等，熊芷，〈江西婦女工作之展望〉，《江西婦女》，創刊號，頁3。熊芷的看法與新生活運動時，中央倡導改良國民生活的見解十分吻合，事實上，訓政時期國民政府施

婦女的角度，把農村婦女視為他者，這種根本的偏見決定了贛省婦運的內在困局。一方面鼓動農婦發揮既有的潛力，另一方面又深怕動搖農村秩序，這個兩難的抉擇註定了無法真正解放農婦。說穿了，組訓的結果是讓農婦更安穩地待在農村原有的社會秩序中，贛省戰時婦運難解的內在矛盾，深刻地反應在各縣陸續開展的婦女活動中。

四、幹部決定一切：知識婦女對農婦生活的改造

戰時江西省在知識婦女對農婦進行組訓後，締造了領先他省的動員成果。各縣婦女處的工作自民國 26 年陸續展開，在動員婦女數量及從事戰時服務上，有著令人注目的成績，眾多農村婦女有組織地走上抗建的道路。吉安의 保隊長及班長，在鄉鎮隊附的帶領下，浩浩盪盪地發動一枚雞蛋募捐運動，藉此向群眾宣傳，結果共募得 6 千枚雞蛋、深入 6 千戶人家，然後由各鄉婦女隊派出代表 10 人，一齊將雞蛋送到後方三十一醫院慰勞傷兵。軍民合作感染了各鄉婦女代表，她們返回後成了最有力的宣傳者。⁸² 弋陽縣的農村婦女比起他處更加幹練與堅強，該縣除了大量捐募慰勞品外，還組織洗衣隊及幫助縫衣，此外，婦女們積極響應動員自

政的重點之一，即不遺餘力地展開對於民眾物質及精神各方面生活的改造，社會改良可說是建構強大國家力量企圖的產物，其最終連結的是無可抵擋的全球化的城市現代性，城市的現代性成為構築新國家人民的標準，即所謂的文明殖民，這個看法參考自 Zvia Lipkin, *Useless to the State: "Social Problems" and Social Engineering in Nationalist Nanjing, 1927-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20. 近代中國女權演變的轉折來看，國民政府訓政時期，強調是國家透過政令及法律形式來申張及保障女權，其中許多內容遠遠超過時代的現實，如女子遺產繼承權的爭取。民國 18 年司法院議決女子不分已嫁未嫁，應與男子有同等財產繼承權，符合現代家庭男女地位平等的理想，〈女子繼承權之解釋-王寵惠呈中央黨部文〉，《申報》，1929 年 5 月 9 日，版 7。該法條最終僅有極少數富室之家有知識的女性受惠，大部分的女性仍然被父系中心、女性終究是他姓人的傳統家庭觀念拘限，對於遺產繼承多半持被動態度。可以說，三〇年代以來，國民政府將女權的理想變成一個國家未來的遠景，從而改變了婦女運動的性質，由過去爭取女權變成了助成廣大婦女覺悟自身的權利，這是婦女運動變成婦女工作的重要過渡。

82 〈吉安婦女指導處七個月來的工作概況〉，《江西婦女》，創刊號，頁 36。

願兵。⁸³ 其他縣份的抗建貢獻亦不勝枚舉，舉凡婦女獻金、募捐、開荒、慰勞傷兵、宣傳自願入伍等，皆有傑出成果。⁸⁴ 轟轟烈烈的抗建任務下，一些婦女工作的困難也逐漸浮顯。各縣組訓往往迴避婦女本身苦難，面對農婦切身的痛苦，工作同仁多半以勸導方式解決。農村中關涉婦女處境最緊密的，莫過於家庭及婚姻，贛省各縣婦指處在初建立時即在工作內容上取消對婦女婚姻、家庭困難的援助。知識婦女提出「好妻子」、「好母親」作為戰時婦運的指導原則，⁸⁵ 它符合了戰時中國統治者不願在社會上挑起更大動盪的考量。一旦農婦前來投訴、請求協助排解婚姻糾紛，工作同仁多半傾向說服婦女順從家庭權力格局，尋求公婆、丈夫諒解。受了訓，擔任幹部的婦女，若反應為了工作而與家庭產生磨擦，同工所提出的解決之道，也是主張工作要與家庭兼顧，不需要二者擇一。⁸⁶ 在家庭問題上，無法替農婦聲援的同工，認為這樣一來或多或少減損了農婦對組訓的信心。除了婚姻家庭問題外，各縣組訓農婦的經驗裡，一些相似的看法在工作同仁之間擴散，大致的觀點是：抗戰建國為動員婦女的中心，對於婦女特殊的利益及要求也不能迴避，應加考慮。⁸⁷ 一些縣份的例證說明照顧婦女利益，能得到群眾熱烈的回響。例如弋陽縣計畫在各鄉婦女隊設立一名衛生員，其方式是挑選年輕聰明的女性受簡易衛生常識訓練，完訓後配備藥箱為鄉民服務，據聞鄉婦對此項舉措頗有好

83 四區一個鄉隊附鄧鳳嬌勸自己的哥哥和幾個年輕壯丁當兵。弋陽在2個月之中，有120個自願兵投軍，發動自願兵工作在全縣婦女幹部會議上列為重要討論議題，是該縣有別於他縣之處。小嚴，〈婦女工作在弋陽〉，《江西婦女》，創刊號，頁30。

84 潘玉梅，〈28年與29年的婦運〉，《江西婦女》，卷2期5（1940年1月10日），頁7。

85 劉桂娟，〈動員婦女〉，《民國日報》（南昌），1938年8月9日。

86 弋陽基層幹部有受訓後不滿婚姻、不滿家庭者，工作同仁對此反應，多半採取「和睦家庭」、「嚴肅生活」來處理。小嚴，〈婦女工作在弋陽〉，《江西婦女》，創刊號，頁32-33。省生活改進會召開的工作人員第三次講習會，會中決議「凡受訓婦女，在家庭中尤應使其與家庭和睦，隨時教導對家庭和善，並教其認識公民權」。〈大會提案與決議摘要〉，《江西婦女》，卷1期4（1939年6月10日），頁26。

87 青如，〈四個問題——婦女工作技術〉，《江西婦女》，卷1期4（1939年6月10日），頁30。

感。⁸⁸

抗建任務與婦女切身利益的結合，攸關組訓完後，如何發展婦女隊工作、健全婦女隊活動。縣級以下的婦女工作因各處資源不同，開展的重點項目須因地制宜。此外，功能導向也不可全然忽略。許多婦女活動未必與行政區劃重疊，因此一縣婦女工作亦可鼓勵橫向的結合，不必全部遷就婦女隊的編制。⁸⁹ 總之，基層的婦女工作必須從訓練再往前推進，各縣的工作同仁不乏體認到，訓練婦女不是最終的目的，它是為了建立組織而進行，一旦基層婦女能夠自動的組織及從事組織的活動，基層婦運才告完成。

基層婦女工作必須調整，同時上、中層幹部也面臨瓶頸。以縣婦指處為指揮中心的婦女工作方式，深化各縣間彼此相隔、工作分散的弊端。全省婦運力量無法統一，連帶著內容不能充實，⁹⁰ 尤其短暫時日間，全省快速累增至二十縣皆成立了婦女指導處，婦女工作頓時膨脹，以致人才不足、工作內容繁雜、幹部對前途失去信心。就各縣婦指處而言，過度信賴個人能力及品格，對工作同仁的工作成果，缺乏客觀評鑑標準；太過強調同工彼此和諧與合作、鼓勵生活上建立親人般的緊密，以致同工犯了錯誤，既沒有糾舉管道，也沒有懲罰手段，結果是好與壞、優與劣難以判定及考核，加以婦女從事公共事務被譏評易犯了氣量小、愛爭權與一時興起的毛病，贛省婦女工作也面臨類似的威脅。總之，人事問

88 小巖，〈婦女工作在弋陽〉，《江西婦女》，創刊號，頁31。

89 婦女隊是一種縱的組織概念，婦女生活改進會曾提出在城區工作的方式，可側重橫的結合，按照婦女的知識、程度、職業組成婦女團體，其工作與其他各救國團體聯合進行。〈大會提案與決議摘要〉，《江西婦女》，卷1期4，頁24。

90 雖然省婦女生活改進會曾提出四項活動，作為各縣婦女組訓完成後的主要工作，許多縣未必遵行。如豐城縣就成立了他縣沒有的救國室，室內分為治療股，備藥品以供解救民眾疾病；代書股，幫忙寫信及文契；書報股，陳列刊物書報以供參讀；娛樂股，有棋及樂器，提供正常休閒；還有婦女班，專門訓練保甲長的太太，增強其工作技能。五花八門的功能及設計，顯示婦女工作只是群眾工作的一個環節而已。艾萍，〈豐城婦指處成立一週年〉，《江西婦女》，卷1期6（1939年8月10日），頁18。

題日益惡化。⁹¹ 贛省婦運從草創走到生根必然要有所改變，草創時期著重個人付出與犧牲，導致知識婦女較輕視組織的運作。同工的去留具有重大影響，而縣級幹部，一直以來便流動頻繁，導致工作中途而廢。一方面為因應組訓完成、婦女隊成立後的繁雜基層工作，另一方面要矯正幹部間逐漸衍生的紛亂現象，發揮組織功能，以組織來約束幹部的行動，從而建立一體適用的監督及考評制度，達到明確權責，避免婦女工作流於敷衍與應付了事的流弊，是為當務之急。其次，強化省內婦運的統一領導，由縣到區鄉鎮的婦女工作一貫到底，在保持既有的工作成果下，又要更進一步推展全省婦女工作。總之，各種挑戰催生贛省婦運走出新局面。

從組織改造來說，省婦女生活改進會在民國 28 年 9 月 1 日正式改組為省婦女指導處，改組的主因是以社團形式來指揮各縣婦女指導處，易流於行政脫節，此外，動員婦女若要前後銜接、持久從事，必須將縣主導改由省方統籌，從上而下將婦女工作從事務轉為政務，以求得到更多支持及奧援。贛省婦女指導處的成立，是近代中國在省這個層級上，建置婦女工作行政化的首例。⁹² 相較於其他省級單位，省婦女指導處可謂全然的新生，既沒有過去官僚體系因革的包袱，卻也缺乏可資參鑒的實際行政運作經驗。作為時代的新生兒，處處流露草創的痕跡，誠如該會指導者熊芷針對改組所發布的宣言所強調的，「省婦女指導處的成立，要樹立清明政治，要能發揮行政最高功能，要提高行政效率」，⁹³「目標是組織要簡

91 幹部離心力有惡化趨勢，主要原因是幹部對前途沒有信心，或由於本身脆弱，沒有堅忍性，受不了工作的艱苦，還有就是省處對幹部注意不夠。吳成，〈對江西婦女工作的新希望〉，《江西婦女》，卷 4 期 1（1940 年 9 月 10 日），頁 5。

92 省婦女指導處地位相當於省政府各廳局，內設處長室、研究室、督導室、組訓科、總務科、生計科等部門，省婦女指導處在中央宣布的省政府組織法中是沒有的，可謂是江西省的創舉。不過，戰時其他省份也有在省行政系統中厲行各種新措置，如廣西建設研究會，曾針對行政管理、實施、指導、稽查、考核等各方面，推出各種理論研究，以助於實際行政之革新。江西省省婦女指導處也可視為是該省地方行政改革下的產物。雷殷，《三民主義行政論》（桂林：廣西省建設研究會出版，1942）。

93 熊芷，〈江西省婦女指導處的成立〉，《江西婦女》，卷 2 期 1，頁 3。

單、人事要上軌道、法規要執行」。⁹⁴ 值得注意的是，贛省婦指處改組之時，擢用大量婦女擔任行政主管，此項舉措一改民國以來，各地行政機關僅有少數女職員任職，並且往往擔任不重要職務的痼習。江西省為數不少的省級女公務員是行政新兵，政務行使對於多數知識婦女而言是陌生的經驗，如何使體系有效地運作成為迫在眉睫的考驗。省婦女指導處成立時，該省省主席熊式輝對全體婦女發表了一番既懇切又戒慎的訓言，他勉勵婦女領導們，「過去沒有體會行政機關經常性工作的繁難經驗，如今要努力學習，行政常識也是一種學問，它不僅只是『官僚形式』」。⁹⁵ 省婦指處成立後，行政地位明確，有些縣份的官員對於境內的婦女運動表示了較多關注，⁹⁶ 使得婦女工作的經費籌措及與各級行政機關交涉也較順利。為了強化省婦女指導處對於各縣的領導中心地位，就在省婦指處成立不久後，召開了縣指導處主任會議。在會議議程上，首先由各縣指導處主任提出工作報告並且進行集體討論，目的是總結前此的工作成績，並在既有基礎上，研擬新的工作方法及技術。

省婦女指導處在主任會議上，以指導者的地位，宣示行政權責的重要性。為徹底釐清過去工作中所浮顯的疑難，必須確定省婦指處具備督核權——包括三個部分，即工作技術的講究、工作過程的檢討及工作同仁的考評。⁹⁷ 在會議上，特別強調工作計劃的重要性，為避免縣婦女

94 民國 22 年，國民政府在甘乃光主持之下進行行政效率革新的工作。贛省省、縣婦女指導處的成立可謂是中國婦女工作行政化的開端，雖說負責人未曾明述其是否秉遵甘乃光的行政效率改革精神，不過，就熊芷所言，無論是整理文書及簡化處理程序，精簡行政單位，都切合行政效率革新的宗旨。Morris L. Bian, "Building State Structure: Guomintang Institutional Rationalization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Modern China* 31:1 (January 2005), pp. 35-71.

95 〈熊主席對二十縣婦女指導處主任會訓詞〉，《江西婦女》，卷 2 期 3、4 合刊（1939 年 12 月 10 日），頁 2。

96 臨川縣長撤去阻撓婦女工作的鄉長，宣布准予婦女隊附免除租稅，吉安各區鄉長自動津貼婦女保隊附辦公費等等。吳成，〈對江西婦女工作的新希望〉，《江西婦女》，卷 4 期 1，頁 4。

97 提升婦女工作的效率，注重各縣工作報告，是為省婦女指導處加強領導的重點項目。不過，工作報告等公文書的定期提出，增添了額外的經費、要求幹部具有報告書寫的能力、並且提供詳細統計資料的記錄整理，對於地方婦女工作人員加重了許

工作只一味地做而忽略成效與影響。省婦女指導處向與會同仁提出執行計劃時，要不斷檢討原案在實行時是否有出入的地方，要不殫其煩地修正改進，才能達到圓滿的目的。⁹⁸ 婦指處的另一位婦女領導人物，再詳加解釋計劃的擬定及執行要慎密精確：

抗戰階段不可太受人力物力財力的限制以至於無法工作，但是我們卻不能向空氣使用人力物力財力，我們要把使用的人力物力財力變成抗建陣營中更大的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才對。有些人在工作時，常常是幾個談談便作，作時既沒有記錄，作完了也缺乏精確的報告，結果作得好，大家興奮一陣，作的不好就算了，這樣不但是證實我們學習精神不夠，就是別人要向我們學習也無法入手。⁹⁹

整理工作與強調計劃的重要，在在說明省婦女指導處試圖將工作技術轉為理性化、標準化。理性化、標準化的落實，目的是追求全體婦女工作人員意志集中，一位同仁感性地說：

省婦女指導處及各縣婦女指導處，縣婦女指導處與縣婦女指導處，應該建立密切的聯繫，團結一致。希望各縣主任在這次會議期間，從集體生活中，從工作討論中，從互相學習中，能進一步的互相瞭解，對於婦女問題及婦女工作有共同的認識，集中意志，以後在工作上密切的聯絡起來，經常的互相鼓勵，互相協助，使我們團結更堅固，意志更堅決，在統一領導之下，集中力量推行工作。¹⁰⁰

省婦女指導處重視行政合理性，在此基礎上來考慮婦女工作，是為贛省突破過去婦女運動格局的重要創舉。

為了將省處的命令貫徹到地方，也為了彌補行政層級的隔閡，主任

多負擔。吳成，〈對江西婦女工作的新希望〉，《江西婦女》，卷4期1，頁4-5。

98 熊芷，〈縣婦女指導處主任會議閉幕詞〉，《江西婦女》，卷2期2，頁15。

99 玉梅，〈工作與學習——作為對二十縣主任的一個貢獻〉，《江西婦女》，卷2期1（1939年9月10日），頁7。

100 雷潔瓊，〈歡迎二十縣婦女指導處主任〉，《江西婦女》，卷2期1（1939年9月10日），頁5。

會議上決議督導制度必須落實。早在民國 28 年 4 月，省婦女生活改進會召開第三次工作人員講習會，即有督導區的建制提議，彼時尚處於討論階段。¹⁰¹ 在過去設計的基礎上，省婦女指導處重新提出督導區的實行規劃，首先，將已設婦女指導處之各縣，依交通路線劃為四個督導區，各區設一督導員辦事處，地點選擇區內中心縣份；編制為督導員 1 人，負責巡迴督導各縣工作，每 3 個月至少巡行全區 1 次，每縣至少停留 1 次，各督導員每 3 個月召集轄縣主任舉行聯席工作會議 1 次，檢討並計劃該區各縣工作，對於行為不檢、工作不力的幹部，要予以懲罰，工作有特殊成績的幹部，要予以獎勵。此外，各區督導員與省處有定期會議，因此督導員還有傳達省處令旨的任務。¹⁰² 就職務屬性及行政層級而言，督導員偏向省處的代表，位階高過縣處工作同仁，因此安撫各級幹部，以及協調幹部與地方勢力間的關係，也是督導員管轄的範圍。¹⁰³ 督導員是省婦指處為彌補省與縣關係不緊密的組織缺陷所設計者，無論其是否真正發揮了督促指導的效能，此舉措是贛省為健全婦女組織所進行的行政設計補強，在贛省婦運轉折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視。

在縣主任會議上，最重要的決議莫過於未來工作計劃的擬定。會議上，在檢討各縣經驗後，省婦女指導處提出民國 29 年度工作計劃草案，

101 最初的督導區規劃是第一區為泰和、吉安、安福、興國、遂川；第二區是寧都、瑞金、贛州、大庾；第三區是南城、光澤、臨川、南康；第四區是浮梁、弋陽、貴谿、鉛山、上饒，基本是將江西全省分成東、西、南、北各四個地理區塊。四區各有一督導員常駐。接近戰區、淪陷區如安義、豐城則另設督導員二人，必要時二人協助其他四區工作，而督導員的工作內容尚未有細部的設計。〈大會提案與決議摘要〉，《江西婦女》，卷 1 期 4，頁 25。

102 〈江西省婦女指導處二十九年度工作計劃草案〉，《江西婦女》，卷 2 期 2（1939 年 10 月 10 日），頁 23。

103 它的設計是各督導區所屬各縣婦女工作人員，定期會議。督導員的工作包括輔助縣級同仁在地方上聯絡行政長官及士紳，及協調婦女幹部與各種地方勢力之間的問題。督導員從最初設計上強調督核縣婦指處，到實行上日益加重輔導功能，反映婦女工作行政化的困難，督導制的變異，是因為縣、鄉（鎮）的幹部多屬年輕婦女，入世未深、見識不足、資歷又淺、在社會經驗缺乏下，無法與地方人士建立良好關係，督導員就要輔導縣、區同工在待人接物及工作方法上，能夠具備靈活態度及適當作風。玉，〈怎樣做督導工作〉，《江西婦女》，卷 2 期 5，頁 28-29。

於總綱中宣示爲了鞏固婦運基礎，新的一年暫不增設縣婦女指導處，而以全力充實既有的工作，統括來說，婦運目標鎖定爲提高婦女文化水準、促進婦女自覺自動及改善婦女生活等方面，¹⁰⁴ 顯示省婦女指導處亟欲在戰時服務之外，發展更加多元的婦女工作內容。有些縣份尚未完成婦女隊編組者，省婦女指導處指示應繼續完成；已完成者，每縣婦女隊的中心工作分爲四大項：第一教育方面，要普設婦女識字班，婦女隊各級幹部及 16 至 25 歲的婦女隊隊員，實施強迫教育；第二衛生方面，普遍訓練接生員，開辦母職訓練班，普及新法助產及新法育兒；第三生計方面，28 年已完成組訓工作之縣份，每縣至少須開辦合作社 4 處至 6 處，及小規模工廠 1 所，職業補習班 1 班，未完成組訓工作縣份，每縣至少須開辦合作社 1 處或工廠 1 所，及職業補習班 1 班；第四戰時工作方面，優待並協助軍人家屬爲中心工作，婦女定期勞動服務，協助出征軍人家屬割禾、摘棉、採茶、炊洗，出征軍人家屬遇有婚喪大事時前往協助。¹⁰⁵ 各縣婦女隊彼此聯合，新的一年舉辦縣婦女隊擴大徵募及慰勞運動，規定每縣選派婦女代表 2 人至 4 人，集合組織江西農村婦女戰地慰勞團，由省處派員領導前往戰地慰勞。婦女隊也要互相競爭學習成果，省處舉行縣識字比賽，28 年度已完成與未完成組訓工作之縣份，分別規定比賽辦法，再分團體及個人比賽，優勝者由省處給予實物獎勵。¹⁰⁶

綜觀民國 29 年度工作計劃，遠遠超過縣內自籌自理的戰時婦女服務活動。許多工作涵蓋省內其他機關的業務，¹⁰⁷ 如婦女識字教育要會同教育廳共同策劃、衛生要有衛生處的支援；生計所涉及的層面更廣，舉凡建設廳、教育廳、農業院，農村合作委員會以及中國工業協會都有或多

104 〈江西省婦女指導處二十九年度工作計劃草案〉，《江西婦女》，卷 2 期 2，頁 20。

105 〈江西省婦女指導處二十九年度工作計劃草案〉，《江西婦女》，卷 2 期 2，頁 21。

106 〈江西省婦女指導處二十九年度工作計劃草案〉，《江西婦女》，卷 2 期 2，頁 21。

107 南京政府成立以來，省級的各部門一直存在各自獨立運作的情況，彼此難以交通並且合作，省婦女指導處的成立是爲強化與省處其他部門間的合作，這是婦女工作由垂直指揮邁向橫向協合的改變。不過，從贛省的經驗來看，省處各部門的合作還是困難重重，有些業務由中央相關部會出面統籌，比起省內部門彼此溝通，似乎仍較順利。Hung-mao 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 pp. 91-92.

或少的影響。這些日趨複雜的婦女工作內容，雖說貼近婦女生活需要，卻難免分割江西省戰時婦女運動的整體力量。

不可諱言，召集縣主任開會、規定縣婦指處定期上繳報告，以及落實督導員考核制度，是省婦女指導統轄指揮各縣婦女工作的重要舉措。緊接著即拉開省內婦女工作行政改革的序幕，大刀闊斧地集權於省方之際，負面效果卻也不免同時顯現，那就是各縣婦女指導處的能動性大大減弱。以 29 年度的工作計畫來說，其所提出的四大項中心工作，在各地發展較好的是婦女識字教育。工作同仁與農婦接觸的經驗，認為婦女大眾潛伏無限的可能，如果能夠提高她們的文化水準，必能增加可觀的抗建力量，¹⁰⁸ 識字教育遂成爲江西婦運最主要的活動之一。組訓後成立的婦女隊，成爲推動農村婦女教育的有力基礎。¹⁰⁹ 關於如何進行農婦教育，按省處規定，婦女隊各級幹部及隊員（16 歲至 25 歲）實施強迫教育；地方負責籌劃識字班的同仁，則將範圍稍稍修定爲有 5 個月以上身孕，以及家中有未滿週歲乳兒，居住地距識字班滿 2 華里者，可不到班。¹¹⁰ 婦女識字教育建立在婦女隊基礎上，似乎是順水推舟，事實上卻遠遠超過省處所設想的簡單。各縣關於識字班在每區每鄉要成立多少班，這類涉及全縣縣政問題須請示縣長及教育科長，甚至必須由教育科出面通令各鄉鎮保嚴格執行強迫入學。各保一旦確定開辦識字班，較好的方法是央請教育科會同婦女隊鄉鎮隊附召開保民大會，針對家長，解釋婦女識字的意義。¹¹¹ 由是，婦女各級幹部在成立識字班的過程中，被稀釋得幾乎成了配角。實際上，保以上的婦女工作人員多半只能在識字班任協助工作，保學老師不屬於婦運系統，他的教學態度及方法，工作同仁無置喙餘地。大規模開辦婦女識字班，不如省處設想的那般輕而易舉，一位幹部評論

108 魏媛，〈充實婦女識字班〉，《江西婦女》，卷 2 期 3、4 合刊（1939 年 12 月 10 日），頁 19。

109 弋陽是首先運用婦女隊組織，普遍推動婦女識字教育的縣份，頗顯成效，成爲其他各縣效法的對象。小巖，〈婦女工作在弋陽〉，《江西婦女》，創刊號，頁 31。

110 龔毅，〈弋陽縣婦女識字班的一個報告〉，《江西婦女》，卷 2 期 3、4 合刊（1939 年 12 月 10 日），頁 29。

111 〈怎麼辦婦女隊識字班〉，《江西婦女》，卷 4 期 1，頁 20-21。

說「婦女識字班好組織、但不好教、也不易收效果」。¹¹² 農婦的切身困難不是省處一紙命令能夠克服，許多被迫來上識字班者，無法長時間忽略家庭工作，導致託病、藉口家事羈絆躲避入學的情況時有所聞，甚至抱孩子來課堂吵擾。省處指揮下的一體化作法招來了民怨，有鄉下婦人沮喪地說：「識字班有什麼用？我學了兩個月，還沒識到個把字，天天丟下孩子在家裏哭」。¹¹³ 歸根究底，不管現實困難，片面地執行農婦識字教育政策的強制作法，導致許多負面的抗拒反應。

同樣的結果也表現在婦嬰衛生的改良上。不可諱言，妊娠對鄉村婦女來說，不僅攸關生死，還涉及嬰孩的存活機會，不少例子顯示在分娩過程中，因衛生不良及醫療設備不足，產婦及新生兒蒙受極大生命威脅。因此產育保健成爲下鄉婦女工作最貼近婦女需要，但也最難發展的活動。首先，產育技術及知識的傳習非一般婦女工作同仁能勝任，它需要經過專門訓練的幹部來指導，尤其要有衛生處的實際支援。少數縣分如泰和、遂川、南城、貴谿極爲重視接生員訓練，卻擴展甚緩、¹¹⁴ 成效低微。另外，生育的高風險與不確定性，助長了圍繞產育牢不可破的迷信風氣。一旦難產，便求告神明；即使順產，也有不可解的古怪禁忌，例如讓產婦直接泡到艾葉水裏等等。¹¹⁵ 產育衛生的傳導，所要推倒的是那些根生柢固，由產婆、產婦共同建立的生產信仰。省處提倡的產育保健以及新法接生，皆屬超時代的理想，要突破傳統的約制，實須長久時日，不是戰時短暫迫切間即可達成。

婦工人員下鄉後，在實際工作的過程中，瞭解到解決農婦切身的痛苦，莫過於予她們一種切實的生計技能，使其在經濟上得以自立。¹¹⁶ 許多受過訓的婦女雖努力於戰時工作，但生活的困苦使她們顧不到工作，

112 魏媛，〈充實婦女識字班〉，《江西婦女》，卷2期3、4合刊，頁20。

113 魏媛，〈充實婦女識字班〉，《江西婦女》，卷2期3、4合刊，頁21。

114 吳成，〈對江西婦女工作的新希望〉，《江西婦女》，卷4期1，頁4。

115 〈十三縣工作報告摘要〉，《江西婦女》，卷1期4，頁19-20。

116 幹部說農婦「不能餓著肚皮識字學習做一進步的新婦女，她們也不能扼住喉嚨為國服務做一個有用的國民」。〈加緊發展各縣婦女隊的生計工作〉，《江西婦女》，卷2期1，頁6。

不得已離開重新又匍匐於生活的重壓之下，所以改善婦女生計成了擴大婦女參與抗建任務的當務之急。此觀點呼應了從中央到地方，獎勵婦女生產，以因應戰爭的持續消耗。¹¹⁷ 江西省的少數縣份，本就有婦女勞動的風氣，¹¹⁸ 如此一來，提倡婦女生產似乎是順水推舟，事實不然，婦女勞動是家庭支配下夫婦勞力分工的產物，它與提倡婦女生產、促成經濟獨立這個來自個體自主的勞動概念相差十萬八千里，後者隱然把婦女從家庭中切割出來，這與農婦一人包辦紛雜的家務勞動，有著本質上的差異。以發展婦女手工業而言，簡易的工廠及合作社在一、兩個縣份出現，¹¹⁹ 如遂川工藝社及婦女縫紉合作社，成立很早。它吸納的是稍具知識並且能夠擺脫家庭約制的極少數婦女，成員招聘已受限制；從成立的規劃來看，真正承擔主持的是江西省戰時貿易部，由其提供資源並出面向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貸款，內部營運的技術人員訓練、經營、管理及產銷亦皆由貿易部負責，省婦女指導處的影響力微乎其微。¹²⁰ 和手工業生產的複雜不相上下，提倡婦女參與農事的困難亦不惶多讓。按省婦女指導處建議婦女可以投入的農事，主要是墾植、園藝以養畜三類，這些卻不是缺乏經驗的婦女可以冒然投入的，許多地區開荒栽種作物，在沒有栽種培育的專門技術指導下，作物整片枯萎凋死，根本無法有理想收成。總之，生

117 為鼓勵婦女參加後方生產工作，新運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提供婦女職業諮詢，成立了婦女諮詢處並訓練了大批的生產技術人員，開辦了許多小型手工業的工廠。與中央婦運相應和，江西省省婦女指導處成立後一年之間，江西各縣手工業的開辦，有遂川工藝社、贛縣工讀班、浮梁紡紗訓練班、貴谿簡易紡織廠，瑞金、寧都則成立婦女合作社。吳成，〈對江西婦女工作的新希望〉，《江西婦女》，卷4期1，頁4。

118 江西農村婦女的生活，贛南、贛北不同，贛南女子是農村主要生產者，耕田、挑擔、操持家務完全由女子一手包辦，男子卻遊手好閒，吸煙抱孩子，跟在女人身後往來走去，即使這樣，重男輕女的風氣依舊濃厚。〈十三縣工作報告摘要〉，《江西婦女》，卷1期4，頁10。

119 貴谿縣政府曾籌資二千元，創辦一個簡易工廠，內分紗布、毛巾、縫紉三組。又南鄉人民較富，曾由婦女集股，辦了合作社，收集婦女的製造品及日用品販賣，也賣工廠產品。〈十三縣工作報告摘要〉，《江西婦女》，卷1期4，頁23。婦女幹部也曾推廣貴谿的鹹菜生產，但畢竟獲利較低，並且打不開市場。〈貴谿的婦女普訓和鹹菜比賽〉，《民國日報》（南昌），1938年5月18日。

120 〈加緊發展各縣婦女隊的生計工作〉，《江西婦女》，卷2期1，頁8-9。

計工作絕非空有熱情就能推動。

省婦指處成立後，意欲以工作技術理性化、目標具體化來整合江西省各縣的婦女工作，並且在縣陸續組訓完成後，轉向充實婦女隊的活動，尤其重視婦女識字教育、婦嬰衛生以及改善生計。這些活動因為牽涉範圍太廣，縣婦指處照章執行，成果卻不甚理想，其後，省婦女指導處對於各縣婦女指導處的指揮似乎遭遇極大挑戰。贛北戰區的婦運無法深入拓展，贛南各縣處於蔣經國的直接掌握中，他在推行新政之時，對於婦女工作的進行與省婦指導處不盡同調，例如贛南著力於禁娼，該舉措攸關社會風氣之改良，卻始終未曾列入省婦女指導處的工作計畫中。再者，蔣經國直接指揮轄境內各縣婦指處的工作方向，如提出「專署出錢，婦女指導處出力」，在贛縣建立農忙托兒所，¹²¹ 省婦女指導處顯然無法與地方大員抗衡，原因在於後者握有財政的優勢。其他縣份在民國 29 年後的報告中，多數表示各縣最有成就的基層工作，還是戰時服務，如群眾集會及演劇都沸沸揚揚。¹²² 省婦女指導處大刀闊斧地籌畫許多婦運前景，縣、區及下層的婦女幹部卻難以承接，訓練與組織顯出脫節的困窘，再加上省行政分歧的干擾，這應當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婦女運動普遍的困境。除非整體農村的社會結構產生裂變，否則婦運終難超脫知識婦女運動的格局限制。

五、結 論

中國知識婦女在抗戰中的貢獻為彼時國人所肯定，並且躍居世界舞臺成為苦難中國不屈不撓的象徵。不過，誠如一些知識女性的反省，中央領導下的婦運模式仍然避免不了缺乏組織的缺陷，如過於社團化，會員基礎薄弱，同時每個團體間缺乏嚴密的聯繫。雖說蔣夫人宋美齡女士

121 農忙托兒所的負責人是蔣經國夫人蔣方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蔣經國在贛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 263。

122 一知，〈怎樣領導婦女演戲〉，《江西婦女》，卷 2 期 3、4 合刊，頁 19-22。龔毅，〈怎樣領導婦女隊開會〉，《江西婦女》，卷 2 期 5（1940 年 1 月 10 日），頁 25-27。

成立了指導全國的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婦女指導委員會作為全國婦運的領導機構，但中央指揮下的各層級婦女工作缺乏強固的聯繫及合作，以致有該急之務不能優先倡導的弊病。時人舉學校的女學生所學始終不見調整配合抗戰婦運工作所需，又沒有導引女青年加入戰時幹部行列的良好管道，導致婦女工作不時有上下交隔的窘境。人才不足是抗戰婦運顯著的一大阻礙。

中央婦運的難題，在江西省婦女運動的實踐經驗中得到適切的修正。該省的婦女動員，從訓練與組織著手，知識婦女進入農村，以培養本地幹部作為工作的第一步。之後，以垂直組織做為基礎，各式各樣橫向的戰時婦女活動由此展開，建立團結深入廣大農村婦女群眾的工作模式。整體而言，本文研究所涵蓋的對日抗戰爆發初期，贛省婦運深入基層、改造農婦、婦工行政化的戰時努力，已由知識婦女集體建立了基礎，其後賡續此基礎，在省內未成立婦指處的各縣繼續進行。直至民國 31 年，因為江西戰局變化，婦運轉趨薄弱，又配合中央調整省級機構政策，已成立的省縣所有婦女指導處組織全部取消，婦女工作改隸社會處負責。

從近代婦運史的角度來看，江西省的婦運走出自發結合的社團活動方式。婦女工作進入行政體系，從工作的決策、執行到考核都轉向官僚化，強調公文作業及行政程序的強制力，該省的婦工領袖曾希望這整個制度能由省推向全國。贛省婦女動員的經驗，一方面烙印知識婦女在近代中國婦運歷史中走出的新里程，一方面也可說明婦運是中國政府面對暴日入侵，依然維持地方行政運作的努力。雖然，動員的幅度及深度確有其侷限，但對於究竟中國婦運該走怎樣的路線，還是提供了一個國民黨婦運史的重要軌跡。尤其是，如果連繫到臺灣 1950 年之後的婦女運動，那麼其中蘊含的變遷與延續，實為書寫近代中國婦運史不可遺漏的篇章。

江西省知識婦女在抗建婦運中，始終是主角。她們號召各階層婦女參與到婦運行列中，組織、訓練與活動都是她們抗建成績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可否認的是，團結群眾婦女負起抗建任務，是抗戰知識婦女最動人的號召。表面上，它突破前此婦女運動爭女權的瓶頸；不過，骨子裏

卻擁抱城市現代文明，以其為標準來改造農村文化。此點與 1950 年代後，中國共產黨高唱知識婦女下鄉，向農民學習所追求的去城市化有著不同的去向。國、共兩黨都在找尋一條婦運通向現代之路，或許，1980 年代中國城市的婦女文化再度掌握發聲權，以此回溯歷史的變與不變，那麼關於 1930 至 1940 年代的婦運研究就更具意義了。

Women Intellectual Youth in the Countryside during the Early Sino-Japanese War: The Case of Jiangxi

Huei-ling Ke

Abstract

The Sino-Japanese War reopened a space for the women's movement to assert its political and social claims after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The war saw numerous calls to unite all the women of the nation under the banner of national salvation. Since peasant women the majority of China's women, the women's movement turned to the question of how best to mobilize them. After the war began, a great number of urban women moved inland, and they combined the goal of women's emancipation with the goal of national liberation, thus reconstructing the basic mission of women intellectual youth. The goal of mobilizing peasant women created a new direction during the war, and women intellectual cadres' new work experience taught the women's movement how to go deep into the populace. Journals, newspapers, and public documents did not entirely represent the voices of peasant women, since the lives of the educated youth remained so different, but rather to some extent the "othering" of peasant women by women cadres. This article thus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the mobilization of peasant women in Jiangxi Province by women intellectual youth during the war.

Key Words: Sino-Japanese War, women, village, mobilization